

人的心理是在
'动中'也就
观世界的交
产生的'也
实践的'发
的。在心理
贯彻辩证
就是贯

纪念曹日昌先生

(1911-1969)

学术思想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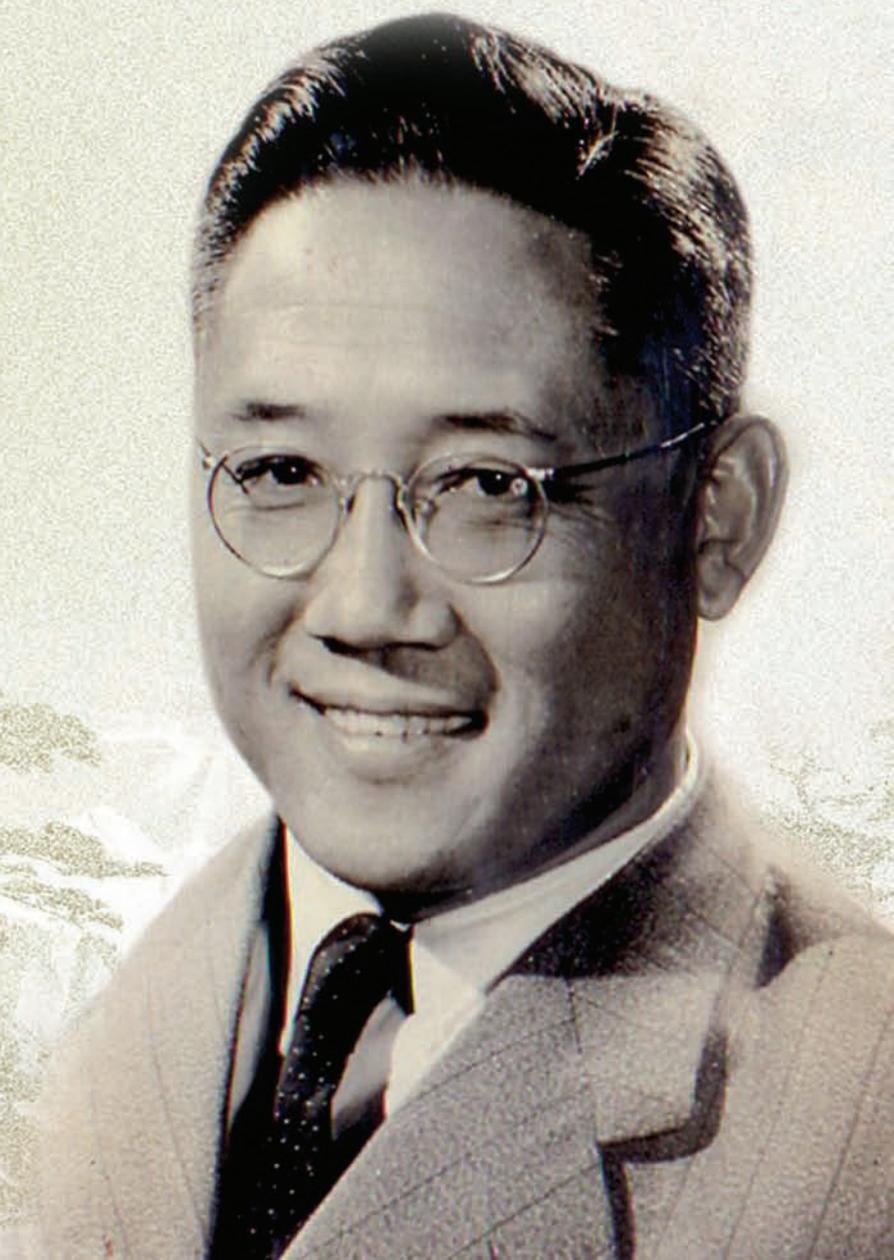
诞辰

100

周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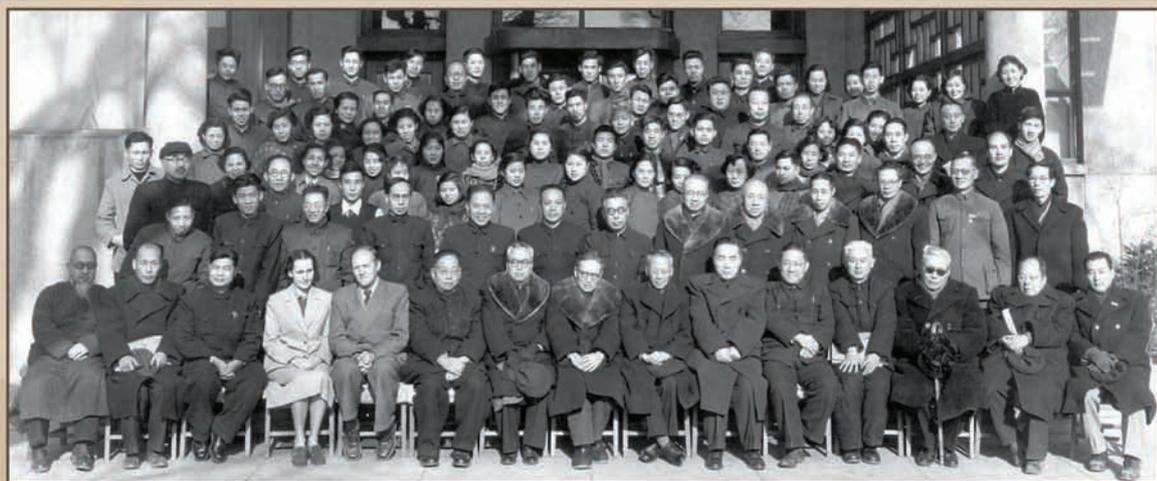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AS



学术活动



1955年8月1-12日，在北京北纬旅馆召开中国心理学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心理学会，曹日昌（前排左一）任副理事长。



1956年12月22日，在北京和平宾馆举行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及所学术委员会成立大会，曹日昌（前排右五）任副所长和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1954年夏，曹日昌（前排左四）在北京东观音寺10号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室接待苏联科学院代表团的专家瓦罗宁的合影。



1956年秋，曹日昌（二排左三）在北京东观音寺10号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室接待民主德国心理学家歌德沙尔的合影。



1957年，曹日昌（右三）随心理所考察团访问民主德国



曹日昌主编的《普通心理学》



曹日昌手迹

目录

- 2 傅小兰 - 矢志报国 忠贞不渝——在曹日昌先生学术思想暨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上的致辞
- 4 曹日昌 - 心理学研究什么？
- 11 赵莉如 - 曹日昌传
- 21 张侃 - 令人景仰的曹日昌先生——在纪念曹日昌先生诞辰95周年暨《曹日昌心理学文选》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
- 24 林仲贤 - 深切怀念曹日昌先生
- 27 孟昭兰 - 纪念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前所长曹日昌教授诞辰100周年
- 30 章志光 - 坚持真理，忍辱负重的学者——纪念曹日昌先生冥诞100周年感言
- 32 张瑶 - 怀念曹日昌先生
- 35 段惠芬 - 值得我一生怀念的人
- 37 郑和钧 - 学习曹日昌心理学思想
- 42 张侃 - 为了不能忘却的记忆——写在曹日昌先生诞辰100周年
- 48 方至 - 纪念诗作-七律 缅怀曹日昌先生
- 49 曹增义 - 爸爸，妈妈，我是你们的儿子
- 54 《心理学报》编委会 - 怀念曹日昌同志
- 55 董桂香 - 回忆
- 57 丁宗一 - 翘翘革命愆卑脏 文化不与论短长——纪念曹日昌伯伯诞辰100周年

CONTENTS



矢志报国 忠贞不渝

——在曹日昌先生学术思想暨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上的致辞

傅小兰

各位老师、各位来宾、曹日昌先生的家属以及新闻界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在这里隆重纪念曹日昌先生诞辰100周年，缅怀他对新中国心理学的创建和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弘扬他的崇高精神，激励广大心理学工作者献身科学、科技报国、创新为民！

曹日昌先生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我国著名的心理学家。他毕生从事科学工作，是新中国心理学的重要开拓者和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重要创始人之一，为发展我国的心理学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曹日昌先生1911年1月11日出生于河北省束鹿县。青年时期就读于清华大学心理学系，获理学学士学位；毕业后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哲学心理学系任教；1945年赴英留学，就读于剑桥大学心理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他在香港参与了联络爱国知识分子回国参加建设的工作，为新中国的建设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1950年由香港回到北京工作，曾任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副局长、办公厅副主任，院党组成员。曹日昌先生积极领导了筹建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和中国心理学会的重建工作，兼任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筹备处副主任。1951年，心理研究所成立时，曹日昌先生担任首任所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心理学会副理事长，1956年任《心理学报》主编。

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受林彪、“四人帮”错误路线的迫害，曹日昌先生被诬蔑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遭到隔离审查和批斗，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于1969年3月14日含冤病逝于北京。曹日昌先生的夫人色尔玛女士在“文革”期间也饱受株连、含冤离去。粉碎“四人帮”后，曹日昌先生于1979年4月得到平反、恢复名誉，被强加于他身上的各种错误结论被彻底否定。

曹日昌先生对新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是最早应用唯物辩证法于心理学研究的倡导者之一。他主张心理学应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指导，研究依赖于社会实践的心理现象的普遍规律。他在实验心理学和心理学基本理论两个领域做出了具有开创性影响的

研究工作，尤其是在学习、记忆研究方面贡献卓著。他早年进行的心算工作效率研究，开创了心算、笔算和珠算三结合教学的先河；他对学习和记忆中的时间间隔问题所做的系统详尽的探索研究，堪称我国该领域研究的典范；他主编的《普通心理学》是新中国自编的第一本心理学大学教科书；他也是我国运用信息加工理论研究记忆的开创者。曹日昌先生在心理学基本理论方面更是成就斐然，他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客观评介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和对待各种学术争论。早在20世纪40年代，他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对心理测验的若干问题进行剖析，为构建新的心理测验体系提供了理论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心理学研究。晚年，他更加明确指出心理学应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自己的基本观点，并运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及现代科学技术去研究依赖于社会实践的心理现象。

曹日昌先生为新中国的科学事业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和对外学术交流工作，为兴建和发展中国心理学事业付出了心血。他联系全国各个设有心理学专业或课程的高等院校，制定中国心理学发展的远景规划，展开大规模的协作研究，学习国外心理学的先进理念，推动心理学的研究工作朝既深入又广泛的方向发展。他以身作则，亲自带领研究人员上工厂、下部队、到医院、去学校，带领大家面向世界，为祖国建设努力工作。他亲历亲为，组织同行工作者翻译和撰写心理科学的专著、论文，并筹划出版事宜。他是新中国建立后心理学界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毕生致力于发展我国的心理学事业。

曹日昌同志热爱党、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忠诚的战士。今天，我们纪念曹日昌先生，就是要以他为榜样，学习他对党忠诚、爱国奉献的精神；学习他追求真理、献身科学的精神；学习他勇于开拓、攻坚克难的精神。切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心理学工作者的光荣使命，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曹日昌先生的崇高精神和卓越风范与山河共存、与日月同辉！
谢谢大家！

2011年7月5日

心理学研究什么？

曹日昌

心理学，顾名思义，是研究意识的规律的科学。意识的含义很广，正如不是所有关于物质的问题都是物理学研究的对象，也不是所有关于意识的问题心理学都进行研究。心理学所研究的，大致是关于意识的下列三方面的问题：

1. 意识的起源、发生和发展。物质发展到什么阶段产生了意识？意识又如何由低级状态发展到高级形态？
2. 人对客观现实的反映过程。人经由什么过程和机制反映客观世界产生意识？
3. 人的意识活动的特征。人的意识活动有什么特征？这些特征是怎样产生的？

.....◆ 一、意识的起源、发生和发展 ◆.....

研究意识的起源、发生和发展，主要是动物心理学的任务（儿童心理学和人类心理发展史也有关系）。动物心理学的许多研究成果，都是有重要意义的。例如，它的研究表明：如以条件反射的形成作为具有心理活动的指标，那就可以看到心理现象是同神经系统相联系的，因为具有神经系统的动物，在适当条件下大都能形成条件反射。可以说，心理是神经系统活动的表现，是神经系统的机能。动物神经系统的原始形态是腔肠动物的网状神经。网状神经是由低等腔肠动物的神经——肌肉细胞发展来的，后者又是由低等多细胞动物的普通细胞分化出来的。

一切生物机体组织（细胞）都有感应性。当营养物或伤害性刺激直接作用于机体组织时，机体就会发生反应。例如，植物的

叶向光和根向水生长，变形虫以至水螅攫取食物和避免伤害性刺激，都是如此。有了神经系统之后，动物就可以感受同生命有间接关系的、远距离的刺激，或“信号”刺激。条件反射就是对信号刺激的反应。神经系统的活动有两种基本的形态，即兴奋和抑制，它们都同生命的基本机能——代谢作用联系着。兴奋是神经细胞的分解作用的特殊形式，抑制则是合成作用的表现。所以神经系统的机能是生命的基本机能之一，它使动物扩大生活环境，反映环境情况，以适应环境，保障生命生活。

随着动物演化阶梯上升，神经系统趋于复杂，心理活动也趋于灵活、丰富。（1）低等动物所能反应的环境变化的范围很狭小，它们只能对于那些同生活直接有关的事物才

发生反应。动物在演化阶梯上位置越高，所能反应的环境变化的范围越广，如猿猴搜索和玩弄同生活不相干的东西，从而也丰富了它的生活内容。(2)动物在演化阶梯上位置越高，反应活动越灵活。低等动物即使动作无结果也不易停止。例如，蜘蛛结网捕虫，虽无小虫落网，蜘蛛每次都趋向网振动的来源方位；虎豹虽也因风吹草动作捕猎的准备动作，但如无捕获对象，虎豹就立刻停止行动。低等动物很难改变它的本能活动，如灯蛾扑火，至死不变。虎豹本来怕火，能吃人，但马戏团中的虎豹能钻火圈，唯训练者的命是从。所以越到高等的动物，越能由个体的经验适应环境。(3)心理活动的趋于灵活和丰富，是由于分析和综合能力的发展。低等动物只能反应环境事物的单一性质上的变化。如只要蜘蛛网一振动，蜘蛛就趋向网

振动的来源方位，不管有无小虫。高等动物能综合有关事物的多种变化，给予适宜的反应。蜘蛛不能区别小虫落网同其他原因使网振动，虎豹则极易辨别附近有无捕获对象。这一切说明意识是物质的属性，是物质发展到一定阶段，即神经系统出现时的产物。意识也是由萌芽状态、低级阶段有规律地逐步向高级形态发展的。动物心理的演化发展为人的意识的出现准备了前提条件，人的心理同动物的心理有一定的连续性，所以了解动物意识的发展对于研究人的意识活动是有帮助的。例如，达尔文由于对动物的研究，了解了人类许多种情绪表现(如愤怒时的咬牙切齿)的由来。意识发展的研究更有理论意义。所以列宁把“动物智力发展史”列为构成认识论、辩证法知识领域之一。对动物心理学研究的任何轻视都是不应该的。

二、人对客观现实的反应过程

心理活动或神经系统的机能是反映环境情况，意识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动物、特别是人如何反映客观现实而产生意识，这是心理学的核心问题。

人在接触客观事物时，客观事物作用于感觉器官，由感觉器官到大脑和反应器官，发生一系列的神经活动历程，在大脑发生神经活动时人便感觉到作用于感觉器官的事物，这就是感觉。由感觉的痕迹形成表象，同类的表象经过概括形成概念，运用概念进行思维。通过思维，人对客观现实可以有更深入地反映。人由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产生对客观事物的态度，满意、不满意(情感)、躲避、斗争、改造(意志)等，这是对人自

己和客观事物关系的反映。对这一系列的反映过程，心理学都进行了研究，也有了一定的成果，找到了一些规律。例如，感觉相互阻抑和助长的规律，差异感觉的规律(威伯律)，分配识记优于集中识记的规律，以往速度的规律(遗忘曲线)等等。这些规律具有理论意义。它们的获得使人对于人如何认识客观世界，也就是对人的认识活动有了一些了解。

掌握心理活动的规律对于指导生产和其他社会实践活动具有重要意义。例如，工业上凭视力和听力检验产品质量的，不能不注意差异感觉的规律。教育上安排学习和复习，不能不注意学习和识记的规律。各种专

.....

业心理学在其特殊领域内研究人对有关的客观事物的反映过程，研究所得成果对于提高有关业务的工作效率有重要意义。例如，教育心理学者研究儿童如何掌握数的顺序、关系和实际意义等以形成数的概念，根据研究所得，可以改进小学的算术教学。劳动心理学者研究劳动者对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如何能有更迅速、全面和准确的反映，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防止事故，减低劳动强度。医疗心理学工作者研究病人对致病原因和病症的反映如何影响致病和医疗过程，从而制定心理治疗的原则和方法，以促进疗效。

反映是脑的机能，心理现象是脑的活动的表现，因而心理现象为脑的活动规律所制约，也表现出脑的活动的规律性。例如红绿两色互相衬托，倍觉鲜艳；同样的小块灰色纸，贴在蓝纸上显出灰黄色，贴在黄纸上呈现蓝灰色，这叫做颜色对比。又如先后紧接学习两种接近的事物，先学习的干扰后学习的，后学习的妨碍对先学习的记忆，前者叫做抑制，后者叫做倒摄抑制。再如注意的集中和涣散，集中注意一事物时对其他事物常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集中注意较久时又不免精神涣散。这几种现象看来好像没什么联系，但我们认识大脑活动规律之后，就知道这都是由于大脑的兴奋和抑制过程的相互诱导所致。

对于人脑活动的规律，现在知道得还很少；对于多数心理现象，我们还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不能从脑的活动规律来说明。

例如对于差异的感觉，何以光的亮度差异达1%，重量差异达1/30，声音强度达1/10，才能感觉出来，不同感觉领域何以比例不同，现在都还没有全面的解释。又如年岁稍大的人都经验过，有时对很熟识的事物，忽然忘记了（如很熟识的同志见面时叫不出名字来），过一会儿又忽然想起来。对这种现象现在只能说是由于大脑内一时的抑制状态，但何以如此，还不明白。

“脑是思维的器官”（列宁）。对于脑的活动规律认识越多，对于意识活动才越能有比较深入的全面的了解。掌握了人脑活动的规律，也就有可能运用这些规律，提高脑的工作效能。例如，将来掌握了有关记忆的脑的活动规律，就有可能提高记忆的效能，使需要的经验能随时回忆出来。

心理学必须研究脑的活动规律，列宁曾指示心理学家要“径直研究心理现象的物质本体（神经过程）”。当然，对于脑的研究，心理学要同生理学有适当的分工。大致生理学研究脑的内部的物质运动，心理学研究脑的活动如何反映外界事物。生理学的研究对于心理学是非常重要的，如巴甫洛夫所说，生理学的研究“替心理学知识打好根基”。心理现象的规律对于生理学的研究也常有指引作用。例如，联想的规律对于暂时联系和接通机能的生理学研究，无疑是有启发意义的。阐明大脑机能是心理学、生理学和其他有关科学的共同任务，以为心理学不必从事脑的机能的研究，不是正确的看法。

三、人的意识活动的特征

由动物发展到人是一个质的飞跃。由于有了社会生活、语言和劳动，人的意识有了新的面貌，同动物的心理已有本质的不同。

人的意识活动的最显著的特征是自觉性和能动性。人不仅有意识活动，还知道自己有意识活动。普通所谓“有意识的”活动，也就是“自觉的”活动。意识的自觉性是同语言分不开的。人有了语言，能叙述当前的客观事物，也能叙述自己的活动。儿童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儿童初步掌握语言时，只能称道客观事物或自己的要求，不能描述自己的活动。到能描述自己的活动时，有计划的活动——这是自觉的意识活动的表现，也就出现了。一种极为可能的情况是：有了反映客观现实的意识活动和对这种活动的叙述，这种叙述由对人到对己，由用有声的完备的语言到用无声的简略的语言，逐步发展成为自觉的意识活动。

儿童有自觉的意识活动是脑的第二信号系统逐渐成熟、两种信号系统协同活动的表现。客观事物引起两种信号系统的协同活动，产生自觉的意识。如果只引起第一信号系统的活动，如在睡眠中因感冷热而盖上或拿开被盖，那就是不自觉的活动。心理学对于人的意识的自觉性了解还很少，如果不从脑的活动机制方面进一步研究，那是难于获得更多结果的。

人在接触外界事物的活动中，外界事物作用于感觉器官，引起大脑活动产生感觉，人根据感觉调节接触外界事物的活动，又进一步影响外界事物。这是人对客观现实的反

映过程的简约叙述。人对客观现实的反映是在作用于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中获得的，对现实的反映又进一步指导实践活动，就是反映的能动作用的表现。人的意识反映客观规律，人认识客观规律之后，用它改造客观世界，这是意识的能动性。意识的能动性是由意识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这一本质产生的。这在儿童心理的发展中也可以得到旁证。儿童最初表现主动性，声明“我自己做”，是在他初步掌握了运用玩具或工具的操作方法之后。这表明：掌握了客观规律，就表现出能动性。人掌握了客观规律就能预见到事物的将来，如马克思所说“劳动过程终末时取得的结果，已经在劳动过程开始时，存在于劳动者的观念中，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了”。关于将来事物的观念（表象）在脑中形成一个优势兴奋中心，由于往复的神经过程，它影响调节有关的神经活动，这可能是意识能动性，也是预见性和自觉性的生理机制的一部分。心理学上研究意识的能动性，必须对意识是客观现实的反映这一本质进行深入的研究。

人的意识活动的另一种显著的特征，是每个人的意识活动都有其个人特点，这是个性。在阶级社会中，同一阶级的人也有其共同的特点，以别于其他阶级，这是阶级性。对于个性和阶级性，心理学也应该研究。

一个人的个性同他与生俱来的体质有关，但主要是在生活经历中形成的。个性主要是一个人的社会关系、生活条件的反映，阶级性是社会地位的反映。个性和阶级性的

.....

主要表现是意识倾向性，即对客观事物的态度，如对一些事物倾向于接受或这样处理，对另一些事物倾向于拒绝或那样处理。意识倾向性是通过多次的感性认识（反映）经过概括形成的。例如，有一个中学生缺乏爱护公共财物和集体注意精神，学校要他去参加工厂劳动。他第一次看到、后来又同工人一起用边料废料做出了很有价值的产品，于是他他对公共财物的态度改变了。他参加了流水生产线工作，他看到他的工作如何影响他的前后的工序的工作，于是他对协作的责任心和集体主义精神也加强了。从这里看出来，改变意识倾向性需要经过具体的认识过程（也就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心理学研究个性和阶级性，要看人如何通过对他的社会生活条件的反映，形成个性和阶级性。掌握了个性和阶级性形成的规律，也就可以根据它进行培养、改造和教育的工作。

个性和阶级性都是生活条件的反映，而反映是大脑的机能，因此，研究个性和阶级性也不能忽略脑的反映机能的规律。例如，个性和阶级性都可能不能适应当前社会生活条件的情况，也就是意识落后于现实。如果不理解脑的活动规律之一——动型的形成和改造，那是不能说明“落后”的现象的。

个性和阶级性影响意识活动使它表现出个人或阶级的特色，具有个性或阶级性特色的意识活动也还是遵循意识活动的普遍规律的。例如，一组人学习一个文件，事后有人记得多，有人记得少，有人记住这些，有人

记住那些，这是个人特色，但从这里总结出记忆的普遍规律，如有意义的识记胜于机械的识记，遗忘的数量因学习后的时间距离不同（遗忘曲线）等。又例如，工人在政治觉悟提高之后工作效率提高，创出奇迹，这是阶级性的表现，但也是意识活跃集中容易引起创造性活动这一普遍规律的表现。研究个性和阶级性对意识活动的影响，可以深入了解意识活动的普遍规律；掌握了普遍规律，更有助于了解以至教育改造个性和阶级性。教育工作要“因材施教”，是照顾个性特点；目的在“全面发展”，又是克服一些个性特点。在阶级社会中，阶级地位是社会生活的一个主要方面，但社会生活还有其他方面。反映同社会阶级有关的客观现实的心理意识具有阶级性，反映同阶级无关的事物的心理意识没有阶级性。例如，小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工人的工作热情，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大不相同；但儿童的关于数的概念的形成过程或交通工人对路上各种信号的鉴别过程，在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什么差别。个性、阶级性和心理活动的普遍规律，是特殊和一般的辩证关系。对于个性和阶级性同心理活动的关系，心理学还须进行深入的研究。只强调一方面，如只承认共同规律不承认个性和阶级性，那是极端错误的。认为个性是心理的主体，它决定一切心理活动，阶级性是心理意识的核心，它调节和支配一切心理活动，这种说法也是值得商榷的。

四、研究的方法决定于研究对象的性质

人的意识活动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现象，用什么方法进行研究，也是一个问题。研究的方法决定于研究对象的性质。如果研究的对象是受阶级影响的，当然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例如，在神经衰弱的致病原因中，对社会生活和工作的态度常是一个因素。有人对工作异常负责，夜以继日的工作，因过度疲劳而致病；有人昼夜考虑自己的名位待遇，对一切事都不如意，因抑郁忧虑而致病。这两种人显然具有不同的阶级意识，在诊断和治疗中必须考虑到这种差异。但在进行了这样阶级分析之后，还必须研究疲劳何以致病，忧虑何以致病，这里不能再用阶级分析而要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了。

人的意识活动并不全部都是受阶级影响的。心理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即人对客观现实的反映过程，是不随社会生活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个性虽是社会生活条件的反映，同阶级地位有密切的关系，但个性的结构（个性表现的方面如能力、气质、兴趣等）和个性形成的规律，并不因阶级而异。心理学所研究的人在各种社会实践业务活动中的反映活动过程，也不因阶级不同或社会生活条件不同而不同。例如，儿童在两岁前后掌握语言的过程，炼钢工人对火焰火花的鉴别过程，在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什么差别。心理学研究这些问题，必须因问题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方法，而不应该对所有问题都应用阶级分析。事实上，对大部分的问题是应用阶级分析的。有人主张在研究阶级社会中人的心理时必须贯彻阶级分

析，这本身可能是一种缺乏分析的说法。

目前心理学还在幼年发育阶段，研究成果不多，研究方法也不够成熟。现在心理学研究的主要方法，还是在各种实践活动领域，观察和记录人的意识活动，从这样得来的材料中分析总结人的心理活动的规律。这样既可以获得科学成果，也可能协助解决实践活动中的问题。这是目前心理学中大量研究工作的方向。

但是，科学研究需要进行深入分析，只观察记录是不够的。要获得确切的成果，还要在控制的条件下对基本过程进行分析，这就是实验法。过去心理学中不少研究成果，是从实验研究中获得的，不应该贬低实验方法的效用。随着实验方法技术的发展，过去无法在实验室中研究的，现在或将来也可能在实验室中进行研究。我们不能把心理现象简单化，以为一切问题立刻都能应用实验方法进行研究；也不能把心理现象神秘化，以为它是万份复杂的（这是事实），不可能用现代科学方法技术进行研究（这是武断的）。其实，心理意识也是物质运动（脑的活动）所产生的，所有的物质运动都有其共同的规律。例如，感觉活动过程同脉冲通讯系统非常类似，就是明证。心理学要研究脑的反映机能，对于脑活动时的内部情况，现在还无法直接观察，这是心理学研究工作遇到的主要困难之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研究脑的活动提供了新的可能。例如，利用讯息论和控制论理论、自动和遥控技术、电子和模拟计算技术等，模拟一些现

.....

实情境，模拟脑的某些活动过程，都是可能的了。并且，心理学者和有关科学工作者协作，也已经在这些方面进行着初步的研究。过去用照相机比拟眼睛，对眼的机能的了解曾有所帮助；现在利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脑的模拟，必将对于脑的活动规律有进一步的认识。对于脑的活动规律的了解，又可对机器的设计制造提供新的原则（模拟人体的机能而制造机器是技术史上常见的事）。我们相信，这种人脑同机器比拟的研究，可能是心理学的一个生长点，应当成为现代科学的一个重要领域。

条件反射实验法对于脑的活动规律的研究有过不少贡献。现代脑电生理学可使我们借脑电现象观察脑的活动，也为研究脑的反映机能开辟了新的途径。心理学应当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科学上新成就，使用一切可能使用的方法，采取多路进军、四面围攻的战略，攻克意识活动这个坚强堡垒。

心理学研究意识的起源、发生、发展和人对客观世界的反映过程。它为辩证唯物

主义提供论据，进一步具体地论证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意识是高度组织的物质的产物、意识是客观现实的反映。这些哲学命题，使辩证唯物主义更彻底地粉碎二元主义和唯心主义。所以，心理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特别是其认识论、反映论的主要科学基础。

意识现象一向被认为是宇宙一谜，人类有史以来就想对它有所了解。黑格尔假定为宇宙本源的绝对理念，在其发展的最后阶段达到“自我认识”。这代表人类要求认识自己的认识的愿望，也表示认识自己的认识是认识的最高成就。黑格尔不能完成这个使命（任何个人也不能完成这个使命），绝对理念是唯心主义的虚构。辩证唯物主义为认识人的认识奠定了基础，唯物主义辩证法就是自然、社会和思维（意识、认识）的运动、发展的规律。心理学研究意识、认识活动的规律，认识了这些规律，也就认识了认识，而达到认识的最高峰。

（注：该文来源于1959年第4期《心理学报》，后收录于《曹日昌心理学文选》第367页-377页。）

曹日昌传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赵莉如

曹日昌（1911—1969），河北束鹿人（今河北省辛集市）。中国心理学家，他是中国最早应用唯物辩证法于心理学研究的倡导者之一。他坚持和维护心理学的正确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在心理学研究工作上，他的突出贡献有两个重要领域：一个是实验心理学，特别是学习记忆研究；另一个是心理学基本理论研究，此二者皆具有开创性的影响。对心理学培养人才和学习国外先进研究成果有杰出贡献，影响深远。在新中国成立后至“文化大革命”前，他兴建和发展我国的心理学事业，建立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并重建中国心理学会，是中国心理学界的主要领导人、中国现代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

.....◆ 一、家境与履历 ◆.....

曹日昌，1911年1月11日（农历的12月11日）出生在河北省束鹿县曹家庄的一个农民家庭。祖辈及父兄均务农，父亲只读过三年书，在乡村写字不错，可写春联、书信，计算田亩账目，对自己终生务农很不甘心，总是鼓励曹日昌读书上进。

1918年曹日昌入本村初级小学，后入宁晋县北圈村高级小学，学习非常努力。1925年考入河北省冀县中学，在中学的后两年受到两位教师的影响。一位是国文教师，经常向学生介绍新文艺，如叶绍钧、谢冰心的作品等，因受其影响曹日昌曾立志要做文学家，阅读了不少文学作品。另一位是历史教师，常向学生讲些中国要革命的道理，这也深深地影响了曹日昌。1929年中学毕业他考入北平师范大学，在预科两年，爱好文学并

爱好上心理学。这时，他和同学一起合办了《芳草》小刊物。1931年升入本科教育系，正逢“九一八”事变，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参加学生运动。

1932—1935年曹日昌由北平师范大学转学至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学习，他发奋读书，除上课外即在实验室。主要进行关于心算问题的试验研究。还在教他心理学的老师周先庚教授示意下，曾对农村心理学进行了研究，写出了“农村运动心理学”一文，于1934年发表。

1935年曹日昌清华大学毕业后，到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简称平教会）先作研究生，后任干事、秘书等职。平教会是晏阳初倡导“平民教育救国”于1934年创立，任总干事长。1936年平教会选河北省定县为实验

.....

区进行乡村平民教育实验。这里聚集了一大批欧美留学人员从事工作，有留学国外者约20人，国内大学毕业者约40人。当时清华大学周先庚教授是留美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博士，时任平教会教育心理部主任，介绍了曹日昌到平教会。曹日昌在周先庚指导下，从事成人学习的心理学研究。1936-1937年，曹日昌在定县做了许多心理测试，写了“定县平校毕业生再测试统计报告”中、英文各一本，并进行“平校毕业生进修与文化活动的调查研究”。此项工作尚未做完，抗日战争爆发，曹日昌随平教会撤退到长沙，1939年夏到重庆，1940年离开了平教会。

1939年曹日昌就开始提倡把唯物辩证法作为研究和建立新心理学的方法。他用辩证法则解释心理现象和心理学的发展。这个时期他还写了不少通俗性的文章，以“教育心理讲话”的方式，宣传普及心理学知识。

1941-1945年，曹日昌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哲学心理学系工作，主要是读书和教课，并在一些进步学生和教授的影响下，参加了进步的社会活动。1943年考取庚款留英，1945年11月到达英国进了剑桥大学心理学系做研究生，一心读书和研究，三年后（1948年）顺利地通过博士论文考试。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是“学习与记忆中的时间间隔”。

1945年冬，曹日昌参加英国共产党的剑桥地方组织的活动，1947年由陈天声和刘宁一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在英国期间，接到国内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指示，组织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英国分会，团结号召学科学技术的留学生回国。

1948年，他在剑桥大学毕业，8月由英国到香港，成为香港大学公开招聘的第一位全日制心理学教师，同时，在乔冠华的领导下，从事联络争取在国外的科学技术人员回国的工作。1949-1950年上半年回国的留学生很多，均由曹日昌经手输送回国。如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教授回国时，就是曹日昌经手具体联系办理的。这些归国的科技工作者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其中曹日昌的工作功不可没。

1947年曹日昌在英国剑桥大学时认识了吴秀明（荷兰人，原名色尔玛Selmavos），不久结婚。1950年夏，曹日昌夫妇从香港回北京。曹日昌到中国科学院工作，1950-1951年，任计划局副局长；1952-1955年任办公厅副主任，分管外事工作；1951-1952年为党组成员。1950年当选为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常委、组织部长；1952年曾任欧美同学会会长。在他任这些职务期间，为科学事业的机构兴建和业务开展做了不少组织联系工作，如积极参与中国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的筹建工作及对外文化交流工作等。同时，1950年，曹日昌一到中国科学院，就由他和丁瓚负责筹建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和中国心理学会。他兼任心理所筹备处副主任和心理学会筹委会副主任；1951年心理所成立，兼任所长，1953年改所为室，兼任室主任；1955年心理学会重新建立，任副理事长。他为此付出了心血，联系全国各个设有心理学专业或课程的高等院校，团结全国广大的心理学工作者，制定中国心理学研究发展的远景规划，展开大规模的协作研究，学习国外有关心理科学和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学说，改造心理学，推动心理学的研究工

作朝既广泛又深入的方向发展。

1956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室与南京大学心理学系合并再建为心理研究所,他任研究员和副所长,这时他才彻底脱离科学院院部的行政岗位,全力从事心理学研究和科研组织工作。回心理所后,他主要负责领导开展有关感知觉心理、劳动心理、航空心理和工程心理方面的研究。60年代,他又开展关于记忆专题的研究,指导有关人员一方面以实验室方法,分别运用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学说及信息理论,研究不同感觉通道(视觉、触觉、听觉)对识记的影响,以探讨识记的心理机制;另一方面,他又紧密结合教育实际,研究初中学生对四字短句、文言文短文等识记方法,并对文言文与白话文的识记过程作了比较分析,力图改进教学方法。

曹日昌一贯坚持和维护心理学的正确研究方向和理论观点,为扭转1958年康生借进行“教育革命”之机,决定批判心理学而掀起的心理学界开展的所谓“资产阶级心理学批判运动”的错误,他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心

理学基本理论的论文,使心理学研究回到正确的方向上来。在“文化大革命”前夕,他顶住极“左”思潮对心理学的袭击,抵制姚文元对心理学研究的诬蔑和破坏。因此,在“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住进“牛棚”受到隔离审查、批判斗争;而且还波及到他的夫人色尔玛(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任英语教师),无辜的曹夫人与曹日昌均遭迫害。曹夫人在心理所隔离时,含冤惨逝后不久的1968年秋,曹日昌被发现已是肝癌晚期,于1969年3月14日逝世。他们的一双年少的儿女被下放河北农村和内蒙古插队。“文化大革命”的灾难造成了他们家破人亡。直到打倒了“四人帮”以后,曹日昌获得平反,1978年6月10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其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这时曹日昌的儿女辗转去了荷兰。25年之后,为编写《曹日昌心理学文选》,心理所在2003年才与他们兄妹有了联系。如今生活在荷兰的兄妹二人,以个人的努力奋斗,均已成家立业,有了满意的生活和工作。

二、早期心理学研究

曹日昌在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学习时,即开始研究有关心理学的问题,并经常写些文章刊于报纸或杂志。教他心理学的老师周先庚知他是个出身农家的子弟,便让他先研究农村的心理学问题。他首先查阅了当时欧美农村心理学的研究资料,并做了研究述要。他深知在这些研究的结果中,所根据的材料和社会背景不同,不能拿到我国来应

用;但可“唤起从事农村工作者和心理学家们的注意,使农村工作心理科学化、心理技术化”,可作为借鉴。他结合当时我国情况提出了农村工作的七个心理学问题:1、农民俗习及成见的考查;对此深切了解,才能控制农民对事物的迎拒。2、天才的选拔;我国农民占绝大多数,其中蕴藏天才。应用心理学方法发现认识、选拔训练他们。3、成人学

习能力的研究；指分析研究中、老年人的学习能力，根据研究结果，以实施开展成人教育。4、特殊教学法研究；应根据乡村儿童的经验创制特殊适用于乡村的教学法，以助乡村教育新发展。5、乡村小学教师学识测验的工作；用科学方法计量其学识和缺陷，根据结果评定程度厘定计划，实施补习。6、农事操作中躯体运动的研究；改变农民手足运动，可以增加工作效率。他举例农活中的“锄草”、“割草”和“划草”的动作分析，如何操作合理化，是很有亲身体会的生动描述。7、心理卫生运动；心理卫生工作的需要在乡村不亚于身体健康事业，可采取“巡行治疗”。文章结尾希望心理学者能从都市的学府中走出来，到乡村参加农村工作，研究农民问题。这是曹日昌最早发表在1934年《民间半月刊》上的论文。距今已有70多年之久，我国农业虽经过天翻地覆的变化，已有了极大的进步，但目前我国仍处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过渡阶段，推进现代化农业，农村的任务相当繁重。曹文中提到农村的心理学有关的一些问题，也是我国建造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内容，仍有启发和现实意义。

这个时期，曹日昌对我国的传统计算工具和方法—珠算，格外感兴趣。早在1933年他在《大公报》发表“在北平市小见到的珠算教学与建议”；1934年在《中华教育界》上连载了他总结的我国有关珠算教学的文献资料，写出“二十年来国人对于珠算的研究述要”；还撰写一本《珠算教学的研究》（1937年出版）。该书对算盘应如何改良？珠算和笔算应是什么关系？口诀应否废除？如何教学拨珠？如何捷算加、减、乘、除、

开方，以及如何编造珠算练习材料、测验材料等问题，都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和确切的论证。该书试图改革传统的珠算教学法，开创了心算、笔算、珠算结合实验教学的先声。与此同时，进行毕业论文的实验工作，他效法德国心理学家艾宾浩斯以自己既做主试者又做受试者，持续三年进行了有关心算（乘和除）的工作效率方面的实验研究，1935年用英文写成实验报告作为他的毕业论文。这篇报告后来节译中文“十二小时继续心算工作之工作效率的实验研究”一文，于1937年发表在《教育改造》上。

1935年曹日昌清华大学毕业后，到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从事成人学习的心理学研究时，他对美国著名的学习心理学家桑代克的学习心理学说及其实验材料与方法进行了详细地分析评论。1936年发表“桑代克学习心理的分析研究”一文，他在批评了桑氏的理论后，提出了研究工作要结合实际生活应用的观点。他认为对学习心理学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因两者目标不同，方法有别，应暂时分开，但又必须密切配合。学习心理理论的研究要严格地持相对态度（反对固定态度），在实验室内做深入的研究；应用学习心理的研究要在实际应用的场合，做广阔的研究。要把实验研究和实际应用打成一片。在探讨决定学习的因素时，他主张不但要横的剖析，还要做纵的追溯，不但要了解一个人学习当时的身心结构，也要了解他的学习历史。他认为实验方法与内容可以决定结果与结论，所以研究时对于一个问题就应当用不同的方法，用不同的材料，从不同的方面，重复地研究实验，因为这样才可以得到详尽的资料，正确的结论。这也是他在从

事研究工作中一贯的作法,表现了他治学严谨的态度。

1936-1937年,曹日昌在河北定县实验区做了许多心理测试,其中他在定县的小学中试用了鲍德斯的迷津测试,并发表了一篇“试用鲍德斯迷津测试初步报告”(1937年)。当时,这类测试曾在京沪一带被作为

智力测试的工具广泛应用。他进行此项测试工作主要是准备作为成人非文字学习和记忆研究的一种工具进行探索。他的研究表明,测试结果可因社会环境、教育程度、主试者和受试者的关系及测验手续的不同而不同;他不同意当时流行的看法,即认为测验是一成不变的东西。

三、学习、记忆研究

1945-1948年,曹日昌在英国剑桥大学心理学系三年期间,对学习和记忆中的时间间隔问题作了系统详尽细致的探索。从事关于分配与集中学习的实验研究,包括三部分:时间与练习的数量;材料的意义与练习的分配;对偶与连续字表的学习。研究结果均发表在当时英国《实验心理学季刊》(1948-1950)上。关于时间与练习的数量研究是在相同时间内做相同次数或不同次数的练习、观察所发生的结果。此问题进行了两项实验,一项是镜画实验(16个受试者);一项是无意义音节实验(40个受试者)。两个实验的结果是用相等的练习次数,分配学习比集中学习更有效。在相等的时间,集中学习即更多的练习能达到较高效率。关于材料的意义与练习的分配研究(24个受试者),结果表明,在学习低意义音节时,分配练习比集中练习有更高效率,但在学习高意义音节时,此两种方式的学习效率只有小的差别。这表明分配和集中学习的效率如何,学习材料的意义性是主要因素。研究对偶与连续字表的学习(24个受试者),结果表明对偶学习,分配和集中学习效率只

有很小差别或无差别,连续字表的学习是更复杂的学习过程,分配学习的优越性较突出。这时期他还进行了有关图形再认的研究,发表在英国《心理学报》(1949)上;镜画学习中练习分配的转变和混合分配的实验以及分配与集中学习的抑制学说的研究,发表在美国《实验心理学报》(1950)和《普通心理学报》(1951)上。在当时,他的实验设计结果,堪称我国有关学习和记忆研究的典范。

60年代初,曹日昌又开始进行有关记忆的研究,他在以前做过的关于图形记忆再认的实验研究基础上,研究时间间隔对触觉——动觉定位的影响。图形记忆再认实验是给受试者呈现一个图形,过了一定时间间隔之后,给他呈现一系列的类似图形,要受试者再认原来的图形或在呈现的系列中指出原来图形所在的范围。结果见到:随着时间间隔的增长,受试者把近似图形当作原来图形的越来越多,指定的原来图形所在的范围越来越大。曹日昌认为这是泛化现象,它和条件反射实验中所看到的泛化现象有一定的共同性。他从巴甫洛夫研究泛化和扩散作用

时利用皮肤机械性刺激在动物身上做的实验所启发，运用了触觉定位研究记忆中的泛化现象。其实验结果有三：1.触觉——动觉、触觉、动觉定位的误差，随施用刺激后与实行定位间的时间间隔的加长而增大。2.上述现象和图形、语文材料记忆中的泛化现象（不能区别相似图形、记住梗概和忘却细节等）有一定共性。3.刺激引起大脑皮层一定点的兴奋，兴奋点影响它的邻近部位，随着时间间隔的加长，这种影响在强度上逐渐减弱，在范围上逐步扩大，可能就是记忆中泛化现象的生理基础。这个实验研究的设计思想和结果，以及只由他本人一人做主试者与受试者的作法，当时令人感到十分新颖和具有独到之处。他很注重心理的生理机制、大脑机制的研究，并在1959年有专文论述，文中重点阐述学习、记忆的生理机制，已提到当时有关大海马部位与记忆关系的最新研究，主张应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探讨脑的机制。今天的认知神经科学也承认要从多个方位、多个层次来探讨脑的本质。

曹日昌在记忆研究中注重运用唯物辩证法，如他认为记忆的发展是一种动力过程。人在记忆时能够对经验分类分组，是由于社会实践中有储存物质的分类分堆的经验，没有社会实践中的分类分堆，人在识记时对材料分类分组是不可想象的。他最早对瞬时记忆和长时记忆进行了介绍和研究，并根据记忆过程运动发展的观点分析二者的关系。他说：“一切事物过程都是有阶段性的，在每个阶段中又各有特殊的矛盾，记忆当然也不例外，识记材料呈现一次后的瞬时记忆是记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这里的主要问题是痕迹形成的问题，主要矛盾是材料内部项目间

的相互干扰，如果把这种干扰减少到最低限度，记忆保持就可较久，使瞬间记忆也具有长时间记忆的一些特点，但在一般情况下这是不可能的。要使记忆保持较久，必须进行复习，复习是重温瞬时记忆，使之延长保持时间。我把这一阶段的记忆称为短时记忆。这里的主要问题是痕迹的巩固，主要矛盾是和有关经验的关系，表现为迁移促进和前摄与倒摄抑制。形成了稳定的、巩固的记忆之后，保持可以持续长久的时间，是长时记忆。这里的问题是能否回忆，也就是痕迹的恢复或运用问题，主要矛盾是回忆线索，回忆线索正确完整，导致正确完全的记忆，线索错误引起回忆阻碍或错误的回忆”。这是他在记忆理论上的一个重要见解。

1962年曹日昌指导了一个记忆专题组，他提出了记忆心理学发展的三个方向：一是生理机制，从生理、生化各方面研究神经组织中的变化与记忆保持的关系；二是记忆效率，从教材组织、识记方法、强化方式等研究提高记忆的效率；三是储存模拟，比较人的记忆和机械的存储系统，以提高存储器件的效率和了解人的记忆的机制。他根据当时的人力、条件安排了具体研究课题：1青少年记忆发展，研究小学高年级和初中学生的记忆特点，提出改进青少年记忆方法教学的建议；2不同分析器活动对识记效果的影响。研究视、听、触、运动等分析器同时与相继活动对相同与不同感觉材料的识记效果的影响，藉以探索记忆的生理机制和较高效果的识记方法；3由瞬时记忆到长时记忆发展过程各阶段的特点，首先从事瞬时记忆的特点和长时记忆恢复的条件研究，探索有效识记和回忆的方法；4记忆不同发展阶段特征

的脑电图谱的研究,用脑电描记方法研究记忆过程的生理机制。可见曹日昌对记忆心理学的研究与发展有他自己系统完整的见解,对记忆专题从不同方面各个角度作了进行研究的部署。1963-1965年,一些研究结果发表了实验报告,如初中学生的识记方法(四字句、文言文、白话文);视、触识记与再认形象的研究;视、听语文材料同时识记的

干扰与相对优势的研究等。后因“文化大革命”的破坏,这个全面的部署被中断。这时曹日昌已把记忆看成是对输入信息的编码、储存和提取的过程,开始研究储存的时间,瞬时记忆、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的问题,他是我国最初运用信息加工理论研究记忆的开创者。他对学习、记忆的卓著贡献,对今天我国记忆心理学的研究发展有很大影响。

四、心理学基本理论研究

曹日昌对心理学基本理论研究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客观评价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和对待各种学术争论。

(一)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心理学研究

曹日昌是我国最早应用唯物辩证法于心理学研究的倡导者之一。20世纪30年代末,他即提倡把唯物辩证法作为创建新心理学的方法,发表“新心理学方法的建立”(1939年)一文,阐明唯物辩证法是进步的科学方法,心理学应该采用唯物辩证法来建立新的研究方法。这时,还写有“心理现象中的辩证法则”和“心理学的辩证法的发展”(1939年)等文章。他用宇宙事物的运动发展中三条普遍法则:矛盾统一律、质量互变律和否定之否定律解释心理现象和心理学的

发展。1943年,他又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对心理测验的若干重要问题进行剖析,发表“心理测验的几个原则的问题”,这是他心理学理论研究的一篇早期代表作。该文首先回顾了心理测验的历史,并指出心理测验发

展40年,之所以“没有巨大的进步”,在于“对几个原则的问题始终没有圆满的解决”。他以量与质、片段与整体、限定反应与自发表现、表象的测量与本质的理解等几对范畴的辩证关系,分析了在心理测验过程中存在重量的多寡而轻质的分析,重片段的反应而轻整体的特质,重限定反应而轻自发表现,重表象的测量而轻本质的理解等现象,从而为构建新的心理测验体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些辩证的分析在今天看来仍有重要价值。

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心理学研究。1954年他发表“中国心理学历史遗产的研究方法问题”,这是一篇要求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历史问题的论文。文中提出三点研究方法:1、历史的研究必须是批判的。他认为批判即是分析哪些是进步的,保守的,甚至反动的;哪些是应继承的,发扬和必须扬弃的;并要把握着进步性、科学性、人民性的批判标准。2、历史的研究必须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他认为对于历史上的任何思想、理论

.....

的研究，一定要把它的社会背景与时代任务弄明白，才能正确认识这种思想、理论及其具有的现实意义。3、历史的研究必须与现实任务相结合。他认为中国心理学当前的最重要任务是建立辩证唯物主义的心理学，对心理学历史遗产的研究也就应围绕这个任务来进行，那就是研究我国历史上有关心理学的学术思想、理论中的辩证法的成分与唯物主义的传统的传统。时至今日，这仍是我们研究心理学史务必遵循的研究方法。

曹日昌主张我国心理学的基本理论研究应建立在毛泽东的《实践论》与《矛盾论》的基础上。他坚持列宁“反映论”的基本观点，强调心理学的主要任务在于研究人的反映过程；心理学应当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作为自己的基本观点，并认为由于心理现象具有自然性和社会性两方面，因此必须并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依赖于社会实践的心理现象。他曾说“在心理学研究工作中要贯彻理论联系实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针。研究选题服从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研究社会主义建设中需要解决的心理问题。贯彻辩证唯物主义在实验研究中就要坚持心理是脑的活动，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这一基本论点，要从客观世界对人的作用和脑的机制来了解心理活动，不能仅以心理活动解释心理活动或把心理活动看作可以脱离现实刺激和脑的活动规律而独立的现象。人的心理是在实践活动中，也就是人和客观世界的交互作用中产生的，也是随着实践活动的发展而发展的。在心理学研究中贯彻辩证唯物主义也就是贯彻实践的观点”。这是他晚年重要理论贡献之一。

（二）坚持心理学的正确研究方法和科学方法

1958年8月，康生策划在北京师范大学开始发动了一场全国性的所谓“资产阶级心理学批判运动”。康生时任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借当时“教育革命”之机，他决定批心理学，他说：共产党是搞唯物主义的，什么心理学？唯心主义该批。并定调说：心理学是党性的阶级分析的社会科学，医学也是社会科学。首先批判心理学教学和科研中表现的对人的心理的生物学化、生物决定论和忽视阶级性等观点，并涉及心理学的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等心理学基本理论问题。在批判中虽指出了心理学教学和研究上值得注意的问题，但也有完全错误的看法。如由批判生物学化，而认为心理学不应从进化史上研究意识的发展；由批判生理决定论而认为心理学不应当研究人脑的活动规律或心理的生理机制；由批判忽视阶级性而认为只有阶级心理，没有共同的人的心理活动规律，更进而主张心理学完全是一门社会科学，它的任务只是研究“工人阶级的心理”和“共产主义的精神面貌”等。甚至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相混淆，造成心理学界的思想混乱。针对这种情况，曹日昌在1959年发表了“关于心理学研究的几个问题”、“心理学界的争论”、“心理学研究什么？”、“由学术批判明确心理学的研究任务”等一系列文章，并组织心理学界开展学术争鸣。在1960年召开的中国心理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曹日昌在会上作了“心理学学术讨论的收获”的总结性发言。明确了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应该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把重点放在解决实际问题的研究上，同时也不应该忽视基

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心理学的对象既要研究阶级的特殊心理活动的规律,也要研究人类心理的共同规律;在研究任务上,心理学主要研究的是人的心理或反映的形式、过程而不是内容;心理学要研究意识问题,目的是解决意识的起源、发生和发展,如何反映客观现实等问题;在研究方法上,除阶级分析外,还须并用其他方法;在学科性质上,心理学应是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中间科学;并提出心理学研究工作的总目标是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迅速地建立起密切结合我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心理学。他的讲话起到了澄清混乱思想的作用,使心理学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夕,社会上又掀起了极“左”思潮,姚文元化名“葛铭人”在报上发表文章,题目叫“这是研究心理学的科学方法和正确方向吗?”他在这篇文章中,斥责杭州大学校长陈立等发表的一篇“色、形爱好的差异”实验报告是用形而

上学的观点,抽象地孤立地研究“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人们对色、形爱好的问题”,借此抨击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和方法。实际上,此文从根本上否定了对色、形爱好进行客观地科学实验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曹日昌顶住这股逆流,他认为科学实验必有一些抽象,才能寻求某些一般的规律,坚持心理学需要应用因素分析的实验研究方法。

由于姚文元对心理学的发难,造成“文化大革命”中心理学的灭顶之灾,曹日昌的家破人亡。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个年代,那种学术思想被政治所左右的严酷气候之下,曹日昌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是需要毅力和勇气的,他是一位经过系统科学训练的科学家,也是很早就参加革命的一位革命家。他对于政治的敏感性,对时代的发展,对于当时的情况是有自己判断的,他经过深思熟虑写出真知灼见的文章,维护着心理学的正确研究方向和方法,是非常不易的事,对后人是极有教育意义的。

五、心理学教材建设和学术译著

曹日昌亲自带头,并发动、组织同行工作者翻译和撰写有关心理科学的专著、论文,并筹划出版的有关事宜。

(一) 主编《普通心理学》教科书

该书是1961年文科教材规划规定编写的供综合性大学、高等师范院校心理专业和教育专业使用的一部基础课教材。曹日昌以苏联A.A.斯米尔诺夫(Cmnphob)著的心理学教科书为蓝本,参考美国E. G. 波林

(Boring)、R. S.武德沃斯(Woodworth)等人的心理学著作,尽量采用国际上最新研究成果并结合中国实际的材料编写而成,材料的内容丰富多彩,每个论点都有实验数据,知识性强,是为传授心理学系统知识的教本,具有较高学术水平。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心理学工作者自己编著的第一本普通心理学教科书。该书1963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上册,1987年出版合订本,至今已重印20多次。当今中国心理学界的年青一代领导者,

.....

他们的心理学启蒙教材都是始于这本教科书，也是心理学后继者必读的经典教材。

（二）翻译《记忆》并撰译序

1965年，曹日昌亲自翻译出版了世界著名心理学家艾宾浩斯（H.Ebbinghaus, 1805—1909）的经典著作《记忆》一书。艾宾浩斯是世界第一个把实验方法用于高级心理过程——记忆的研究者，他设法控制记忆条件，选用“无意义音节”为记忆材料，采用“节省法”测量记忆结果，并以自己作为被试。他的实验研究在心理学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的重要意义。曹日昌从事记忆实验研究即在艾宾浩斯研究的基础上开始的，他也以自己为实验研究的被试者，对《记忆》有深刻体会。在他写的长篇译序中，对记忆研究提出极有价值的理论见解，他历史地评价了艾宾浩斯研究工作的首创意义和不足，特别提出：“从事心理学研究而没有正确的哲学思想作理论指导，虽然有时也可以得到一些具体成果，但绝不能得到关于心理现象的规律的本质的正确结论。艾宾浩斯的工作正是一个历史教训”。

（三）合译《实验心理学》并写译序

1965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曹日昌与他人共同翻译的美国著名心理学家R.S.伍德沃斯、H.施洛斯贝格著《实验心理学》。在译序中，他概述了实验心理学建立的百年历史并指出它的局限性，且受资产阶级的政治目的、庸俗偏见、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影响，受到误用、歪曲，得不到正常发展和充分发挥作用。他举例说明唯心主义者常对实验研究结果给以任意解释，形而上学的表面性与片面性的思想方法，根据部分实验材料，以偏概全地做出结论。因此曹日昌要求我国心理学工作者要担当起发展实验心理学的任务，对传统的实验心理学要分析批判地吸收。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加以总结提高，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定会把心理学的实验研究提高到历史上未有的新水平。

以上例举的三本著作和译著对中国心理学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为我国心理学工作者了解、学习国外的成果，培养我国的心理学人才，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曹日昌本人撰写的自传及有关材料
2. 赵莉如：曹日昌传略刊于《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专略》理学编、生物学卷I
中国科学技术学会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7月出版
3. 赵莉如编：《曹日昌心理学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11月出版
4. 张侃：令人敬仰的曹日昌先生——在纪念曹日昌先生诞辰95周年暨《曹日昌心理学文选》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心理学报》2006.1

撰者说明：

1. 此转略稿原为科学出版社编辑《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一书的约稿，现尚未出版，经征得该出版社同意（内容稍加删改），先行在此刊出。
2. 赵莉如编写时对曹日昌在中科院院部（1950—1955）的主要任职有误漏之处，现经核对确认，曹日昌未任过联络局副局长一职，曾因丁瓚（时任办公厅副主任，兼联络局副局长）事忙无法兼顾，拟改请曹日昌担任联络局副局长，实际上没有正式任职。1951年2月联络局撤销，设联络处隶属于办公厅，1955年12月又成立联络局。曹日昌于1952—1955年任办公厅副主任，分管外事工作。另在1951—1952年曹日昌为党组成员。特借此更正和补充。

令人景仰的曹日昌先生

——在纪念曹日昌先生诞辰95周年暨《曹日昌心理学文选》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

张侃

尊敬的心理学界的各位老前辈们、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同仁，我是昨天晚上才知道要代表中国心理学会作一个发言，实际上我代表我自己已经准备了一个发言，我想把这两个发言结合起来。

可以召开这样一个虽然人数不多但非常隆重的纪念曹日昌先生诞辰95周年暨《曹日昌心理学文选》出版座谈会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是很感动的，也是很激动的。在这里，要感谢人民教育出版社，感谢这本书的编者赵莉如老师，由于他们的工作使我们不仅有了这本珍贵的文选，而且还有了这次开会的机会，就我个人来说，这次会议是对曹先生追思的非常好的机会。当然，我还要代表中国心理学会对人民教育出版社表示感谢，因为曹先生不仅仅是我们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重建的主要负责人，也是中国心理学会重建的主要负责人，并且在这两个机构当中都担任领导工作。另外，曹先生在中国科学院机关也参加过很多组建的工作，其中跟我特别有关系的是，我继承了他担任过科学院外事局的工作。外事局有一些比较老的同志至今还可以记得，新中国成立初期曹先生所做的非常有创意、有贡献的工作。

从我个人来说，对于曹先生，我是一个

后人，只能是一种神往，但是我在心理学界也已经有几十年，在这几十年获得了很多有关曹先生的信息，从认知和情感方面都受到很多教育，并且经历了心灵上的巨大的涤荡和憧憬。

我最初知道曹日昌先生是1978年，那时我到心理所来做研究生，第一天遇到一个同学，问“你是谁的研究”，我说“我是曹传泳先生的研究生”，这位同学是学过心理学的，说：“啊，曹传泳，你知道二曹下江南吗？”我说不知道。据说是60年代我的先生曾经追随曹日昌先生一起到南方去宣传心理学，当时心理学的重镇在北京，南方比较少，所以他们到南方去，被南方的心理学家纪念为“二曹下江南”，算是中国心理学史上一件有纪念意义的事情。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对曹日昌先生的有关事情就特别留意。第二次接触到曹先生，是我的导师曹传泳先生向我说起中科院心理所的历史，对曹日昌先生的学术、人品和贡献给予了巨大的称赞。第三件事情，跟在座的跟我的年纪差不多或者比我年轻的人一样，我们心理学启蒙的教材就是曹日昌先生主编的《普通心理学》，刚才已经说了，已经重印了20次了，我就不多讲。第四件事情，我的一个同

.....

学——卢仲衡老师的学生吴瑞华，他有一次跟我说：“你知道曹日昌吗？”我说：“我只知道名。”他说：“卢先生跟我说，现在我们搞学习、记忆实在是水平太低了，因为跟曹日昌先生比，我们都是九牛一毛。”卢仲衡先生能够在曹日昌先生的身后对他自己的学生这么中肯地提到曹日昌先生的水平，对我们来说印象非常深刻。可见，所有和曹先生打过交道的人都对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1992年我到美国密歇根大学，在那儿见到当时正在访问的荆其诚老师和汪兴安老师。荆老师那天刚好有空，午饭以后跟我讲了很长时间曹日昌先生的过去以及曹日昌先生一家的经历，我心情非常沉痛。当时我心里在想，如果我们有朝一日能够为中国的心理学做更多的事情，我们要很好继承曹先生的传统，像他一样为中国心理学事业的发展诚诚恳恳地做一些踏实的工作。当然后来，我有了这样的机会，可惜现在回顾，做得并不是太好，这是我们后人值得检讨的地方。在此之后，荆老师有多次对我谈到曹日昌先生的一家和他们的贡献，使我对曹先生的认识从理性的认知到了情感的升华。所以，我一开始说，我对曹先生是一种神往。

这次拿到这本书以后，我抽了一些时间比较系统地对这本文选进行了学习，感慨也是非常多的，我讲三点重要的体会，我觉得可以用“三高”来概括我对曹先生的认识。

第一，我觉得曹先生是一位有高深造诣的实验心理学家，一个严谨的科学家。他关于学习、记忆各个方面的研究，在这本文选中收入了19篇论文。这19篇论文，从严谨的

实验设计、问题的提出、文献的回顾，以及在文章当中所体现出来的人文关怀，都体现了曹先生是一个非常训练有素的、非常严谨的科学家，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后人学习。

第二，我认为曹先生是一位高瞻远瞩的科学理论家。在这本文选当中收入了14篇曹先生关于基础理论的研究，曹先生系统地对心理学的理论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早在1939年，他就系统提出了心理学研究要贯彻辩证唯物主义。我看了以后，很感慨，像我们这个年龄层次的人，懂得的历史的东西很少，总觉得辩证唯物主义可能是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以后才提出来的，但是曹先生早在30年代在他到英国去留学之前，已经在各种各样的哲学流派之中明确选择了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心理学的一个基础的指导性思想。曹先生对心理学的任务、研究的方法、学科的特点作了多方位阐述，特别是对于如何看待生物学的影响、怎样看待遗传和环境的关系的阐述，对我们今天仍然有很大的教育意义。他还特别阐述了要从多个层次和方位来探讨脑的本质。今天的认知神经科学也承认要从多个方位、多个层次来探讨脑的本质和意识的本质。

第三，曹先生是一位高风亮节的真理的卫士。在曹先生的论文当中，特别提到了不能阶级斗争简单化，不能把心理学确定为研究劳动模范或无产阶级思想品德的一个学科。我想，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曹先生能够准确地提出这些问题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因为曹先生并不是一介武夫，什么都不懂，他是经过系统科学训练的科

家，他也是很早就参加革命的一位革命家，他对于政治的敏感性、对于时代的发展、对于当时的情况应该是有自己的判断的，他经过深思熟虑写出真知灼见的文章，对我们是非常有教育的意义。

看到曹先生的这个文选，是一个心理学文选，对我个人来说还是有一个很小的遗憾。比如说，曹先生曾经写过一些重要的通讯，我在美国就曾经看过，包括华罗庚先生这样重要的科学家，都是曹先生写信动员回来的。这对中国科学早期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工作，特别是这种通讯当中表达出来的很多个人的人格特点都是非常有魅力的。我希望今后如果有机会拓展的话，能够把这些珍贵的文献以某种方式让我们后人更加系统地学习。

曹先生的贡献是全方位的，曹先生本人是不幸的，错误路线导致他家破人亡，一腔

爱国热血没有得到充分地发扬。但是他也是幸运的，他的一生献给了壮丽的事业。是他的所作所为，使得我们今天能够坐下来纪念曹先生，并且使他的学术和学术思想得以发扬。我们今天纪念曹日昌先生，对我们今后如何待人处事，也是一个很好的启发。过去的不幸是发生在错误路线的年代，但是，在错误路线占统治地位的年代，也不是处处都有像对待曹先生这样的错误。我们心理学界的同仁需要很好地反思，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怎样能够准确地、正确地对待我们的学科，怎样准确地、正确地对待我们的同事，互相保护，使我们的事业不断地发扬光大。今天我们能够有这本书是对曹先生最好的纪念，我要再一次感谢人民教育出版社，感谢赵莉如老师，以及在座的李文馥老师和其他在困难的情况下保存了非常宝贵资料的各位前辈们。谢谢大家！

深切怀念曹日昌先生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林仲贤

我1951年在清华大学心理学系读一年级时，就听说曹日昌先生的名字了，知他是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是留英的，在英国剑桥大学取得心理学博士学位后，返回香港，曾在香港大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服从党组织调动，返回中国大陆，在中国科学院担任计划局副局长及院办公厅的副主任。随后于1951年成立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时，他便被任命为研究所所长。那时我还只是一名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是没有机会认识他的，但我对他是很敬仰的。

1952年我转入北大学习，1955年我从北京大学心理学专业毕业后，很幸运地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工作。同班的同学大都被分配到各高等院校教书去了。当时我心里是很高兴的，因为在心理所我便有机会见到久仰的曹先生及得到他的指导及教诲。

我到心理所报到时，已经是1955年的10月份了。当年分配到心理所的还有北师大教育研究班心理专业的赵莉如、宋维真及北大生物系的邬勤娥。她们都比我早报到。我报到后，也不是经常能见着曹先生，他很忙，那时他在院部还兼任着工作。大约过了一个多星期吧，有天曹先生来了，他找到他的办公室谈话，问了我一些情况，他让我参加二组（知觉组）的工作，这也是他所在

的研究组。这个研究组当时有两个方面的课题：一是感知觉，当时主要是探讨产生“似动现象”的有关因素及影响运动知觉（速度判断）的各种条件；另一是动力定型的顺序反应，这是为进一步开展劳动心理学研究作准备的工作。曹先生让我参加在他领导下的荆其诚老师正在进行着的“速度判断”实验（荆老师那时已是助理研究员了，相当大学的讲师）。曹先生跟我谈话时，对我提出要求，要我经常注意搜集有关的研究文献资料，要将阅读过的文献资料做成卡片，分类保存，定期汇报或写成学习心得。后来，这种阅读文献，收集资料，做成卡片的习惯，在我科研工作中一直延续了下来，使我受益匪浅。

曹先生对年轻人工作和学习方面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他要年轻人多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多动脑子，不要过多存在依赖思想。有一次我向曹先生汇报工作时，说我在阅读的外文资料中有一个英文字词不知在中文中如何翻译表达，拿出来问曹先生，曹先生看了一下便对我要怎么翻译他也不清楚。从曹先生的话中，看出他并不是真的不知道对该字词的准确翻译，而是让我自己先动动脑子如何把英文的原意恰当翻成中文来表达。

有一次我写了一篇“开题报告”请他审

.....

阅,他将报告中列出来的好些文献都给删掉了,并说“开题”不一定要把所有文献都列上,列出一些主要有关的就可以。从中我得到了启发,我们写“开题报告”或写“科学论文”,并不是列出的文献越多越好,而是要把有关的主要文献列出就可以,这样才显得精炼,重点突出。

在与曹先生接触过程中,觉得他为人十分亲切,没有架子,尤其对年轻人,鼓励他们发表不同意见。在学术讨论中,他提倡学术自由,百家争鸣。记得我在清华念大学一年级时,同班一位姓冯的同学对我说,他对曹先生发表的一篇有关“巴甫洛夫的第一、第二信号系统学说”的文章有一些不同看法,写了一篇文章送给曹先生了。曹先生是不认识这个学生的,虽然与他的意见有点不同,但他推荐该生的文章在报刊上刊登了。其目的是想通过这种学术争鸣的方式,激发起我国心理学界对学术讨论的气氛。

曹先生学问渊博,在实验心理学方面造诣很深,尤其专长学习与记忆心理学。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期间,为了促进我国心理科学更好、更快地发展,他领导组织了翻译当时在国际上有着广泛影响的R.S Woodworth的《Experimental Psychology》一书,后又亲自主编出版了《普通心理学》一书。这两本书的出版,对我国心理学的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迄今这两本书仍是我国心理学界不可缺少的读物及主要参考书与教材。

曹先生在心理学基本理论上也有很高的造诣。他能很好的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和指导心理学的研究。他在上世界五、六十年代期间,先后发表了

一系列有关心理学基本理论文章,其中有《中国心理学历史遗产的研究和方法问题》(1954年)、《关于心理学研究的几个问题》(1959年)、《心理学研究什么?》(1959年)、《关于心理学的基本观点》(1965年)、《关于心理学研究中的思想方法问题》(1965年)等等。曹先生的每篇文章,都有针对性,有明确地观点,有独到的见解,用客观事实来论证,引经据典,很有说服力。

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1958年,曹先生、荆其诚、封根泉(曹先生的研究生)与我一起出差到河北涿县的部队空军航校进行飞行员心理选拔的实验工作。曹先生与大家一起动手做实验,一起计算结果,一起讨论工作。曹先生是领导,但他总是以身作则,在出差期间与大家工作生活在一起,激励大家较好地完成了任务。在当年全所的年终总结评比中,“航空组”获得了“优胜奖”。后来在曹先生的直接领导及指导下,“航空组”给当时我国空军的实际飞行出现的问题,开展了“飞行错觉”的实验研究。他让他的研究生封根泉进行具体的实验和操作,让我协助进行。由于实验研究取得了较明显效果,1965年获得了国防部科技成果三等奖,这是心理所建所后首次获得的重要成果奖。

曹先生不仅在工作中能与大家打成一片,在平时生活中,他也是如此。记得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期间,所里每次组织的郊外旅游活动,他大都参加。研究所组织的排球赛,他也参加,与大家一块打球,他那时住在北京的新街口附近的科学院宿舍,每天都是自己骑着自行车来上班,是一位能与职

工打成一片的好领导。

曹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与迫害，失去了人身自由，家庭命运悲惨，他终于抑郁成疾，不幸于1969年3月14日病逝，享年才58岁。他离开我们实在太早了。今天我们纪念曹先生诞辰100周年，缅怀曹先生

对新中国心理科学事业的发展所作出的重大和杰出的贡献，要学习曹先生的无私奉献献身党的科学事业的优秀品德和严谨的治学精神，他永远是年轻人的良师。我们深切怀念曹日昌先生。

后记：

《深切怀念曹日昌先生》一文很可能是林仲贤老师生前留下的最后文字了。我还清楚地记得，老先生在将文章交给我时说：“……。如果还需要修改的地方，请你联系我。”但2011年6月4日上午传来噩耗，老先生已于6月3日夜，因突发心脏病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在一瞬间我都无法相信这样的事实。

林仲贤老师在我心目中是我国心理学的老前辈，但他在《深切怀念曹日昌先生》一文中称，他们一辈人又是曹日昌先生等老一辈心理学家的学生，在大学时代就对曹日昌先生怀有深深的敬意。研究生毕业后，有幸来到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工作，能亲自聆听曹先生的教诲，感受曹先生的学者魅力。通过林老师的纪念文章，使我这个心理学的后来学习者对新中国心理学事业的开创者们有了更深刻和生动的了解。真是让我们晚辈感叹，心理学人才辈出！

在编辑《纪念曹日昌学术思想暨诞辰100周年》纪念专刊的过程中，收集到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和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等国内知名心理学研究院校的老一辈心理学家的多篇回忆曹日昌先生的纪念文章。在我的桌面上，现在就摆着林老师的回忆文章以及林老师帮忙审阅的这十多篇文章。所有文章现都已经作者本人确认，唯林老师的突然离开，还未及修改。看着林老师帮助我们审阅文章时，悉心批注的每一行文字，林老师的声音就回响在耳边，林老师的微笑就展现在眼前，我真得无法相信这样的事实——老先生已永远地离开了……。

林老师、以及林老师的老师曹日昌先生为中国心理学做出的贡献将永远值得我们怀念！他们的杰出成就和高尚品格将永载我国心理学事业的史册。年轻一代的心理学后来人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他们未竟的事业，为我国心理学科学事业的发展而不断努力。

（张莉，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综合办公室 副主任）

纪念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前所长 曹日昌教授诞辰100周年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 孟昭兰

曹日昌教授创办中国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初期，我还是一个刚毕业的年轻助教。我虽然未得到过他的直接教诲和领导，但亲历了从他创办心理所到文革中被迫害的全过程。今天我写这篇缅怀曹日昌教授的文章，心里怀着对他无限的敬意。

曹日昌教授是上世纪50年代初建立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组织者和创办人，也是现代中国心理学科学发展的实践者和带头人。曹日昌教授于1950年开始担任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心理学会副理事长等多项领导职务。建国初期，在他的领导下，我国心理学走上了发展的新起点。

之所以说建国后中国心理学走上发展的新起点，是由于我国早年第一代心理学家陈大齐、唐钺、张耀翔等学者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从西方把心理学引进中国时，我国社会尚不具备心理学发展的土壤，以至它长期处于默默无闻的状态。经过漫长的国内民主革命、抵抗外国侵略战争以及多次内战，中国心理学遇到了战后国内大环境的转变，同时又学习到国外科学（包括心理学）在相当长时期中所获得的发展新成果；信息理论、认知科学已经开始出现。正在此时，曹日昌教授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后回归祖国。因此

我认为，是他在心理所的领导，使中国心理学的研究走上了现代科学发展的道路。曹日昌教授从1950年开始，带领当时为数不多的中、青年学者，在心理所担当起发展现代心理学的任务。在其后的年代中，他成为现代科学心理学在中国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

曹日昌教授前后开展了学习心理学、记忆心理学、工程心理学、心理学基本理论等多方面的研究。例如，他遵循科研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方法，不但揭示了记忆发生的实际心理过程，把记忆过程的实验研究与社会学习的实践相结合，而且对记忆的脑神经机制作了深入的解释。曹日昌教授的实验研究涉及到基础心理学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从感觉刺激到行为、从语言发展到智力遗传、从性格到情绪等心理过程的评述；从劳动心理学到教育心理学等心理学分支的指导性论述；从行为主义、实验心理学到精神分析的学派分析；应用唯物辩证法对心理测验和实验心理学的应用和评论等等。他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心理学研究发展的总结，肯定了建国初期心理学研究的成绩。他的著述全面展示了他所掌握的广泛的心理学领域的知识，反映了他深厚的学术功底。

特别要指出的是，他在心理学的基本理论方面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抵制了1958年泛起的对心理学和心理学家左倾大批判思潮。他针对当时人为造成的思想混乱，发表多篇文章论述了心理学的学科性质。他根据人的心理现象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相结合的这一独特属性，明确地阐释了心理学是研究人脑的生理心理机制与人的社会实践相结合的一门综合学科。他所坚持的心理学科学方法论原则，为其后国内心理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奠定了影响深远的正确理论基础。

曹日昌教授在心理所繁忙的领导和研究工作中，十分关心全国各地高等院校的心理学教学工作。在当时国内尚缺乏教材的情况下，他带头组织国内学者编写并出版了《普通心理学》（上册）教科书（1963年）。由于文革开始，该书下册没有来得及完稿。文革后，在心理学会杭州会议上，决定由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和北京大学心理学系组织人力改编“下册”，并于1979年出版。此时曹日昌教授已经去世，为了纪念他，下册仍以曹日昌为主编命名。1987年，该书出版了以曹日昌为主编的合订本。这本书虽然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问世，却涵盖了当时基础心理学研究的成熟理论和资料成果，成为其后全国基础心理学教学和教科书编写的蓝本，至今仍在印刷发行。

曹日昌所长不仅领导了心理所的研究工作，而且通过中国心理学会的多项活动及个人交往，广泛联系心理学界潘菽、唐钺、孙国华、朱智贤、彭飞、陈立等老一辈专家教

授，以及各地心理学机构的领导人，支持和推动他们的工作。他同时关心青年教师和研究人员业务的成长。他的影响遍及全国各地心理学单位的研究和教学。

心理所与北大是近邻。由于曹日昌教授在心理所担任领导职位，当时处于逆境的北京大学哲学系心理学专业的领导孙国华教授、唐钺教授，有机会与他共同切磋、研讨，处理所谓心理学改造等问题；孙、唐二位先生受到了他的关怀和帮助。这在当时北京大学心理学系教师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使我们年轻一代对他怀着深深的仰慕和尊重。

曹日昌所长为人正直、善良，学术作风正派、严谨。他以身作则，在工作中坚持科学理性思维，严格遵守学术道德作风，为心理所和其它心理学教学、科研机构树立了为学术即为真理的理念，影响了一代年轻学者在科学研究的正确道路上成长。他成为铸造我国心理学研究中良好的学术道德风气的杰出学者。他作为一位科学家所表现的学术风范，影响着几代心理学后人。曹日昌教授是当代中国心理学最著名的心理学家。他的名字已经并将永远载入中国心理学史册。

不幸的是，曹日昌教授得以平静有序地领导心理所的研究工作为时并不长久，在自己的最后年代历尽坎坷。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心理学与心理学家厄运不断，遭受了多次的批判和否定。曹日昌教授身居领导岗位，首当其冲。他面对那些对心理学在理论上的根本歪曲，沉静思考，冷静面对。从1958年大批判后到文革开始，他多次撰写

论文，全方位地提出了科学心理学的方法论原则，并且默默地继续领导着心理所的工作。他的坚毅而沉着的表现，无可避免地受到极其不公正、不人道的待遇。他身体受到折磨，人格受到凌辱。他心系心理学，顾念家人和同事，身心受到极度的摧残，终于过早地逝世。他在生命的最后时期面对残酷的迫害和身心伤痛所表现出来的默默忍受和铮铮铁骨之风，让我们铭记他为真理而至死不渝、为科学而献身的伟大精神。我们在曹日昌教授100周年诞辰之际，纪念这位离我们而去的杰出心理学家，更使我们铭心刻骨，对他的功绩永志不忘。

中国心理学在科学发展史上所受到的曲解和发展的曲折，使我们记忆犹新。事实上，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期持续不断的政治动乱，致使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又被拖后了三十年。然而最近三十年来，改革

开放给中国心理学带来了蓬勃发展的大环境和机会。中国社会在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日益显露出对心理学知识和人才的迫切需要。目前，心理学研究工作的分支已经发展得相当茂盛，心理学教学与研究机构遍布全国，心理学各个领域的研究已经显露出不少有价值的成果，不少中、青年人才正在研究工作中孕育、成熟。我于1978年受命于北大党委主持组织北大心理学系的建立。我们认识到，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我们应以曹日昌教授为榜样，估价总结我们的工作，跟上科学的发展，跟上时代的需要，继续努力，让中国心理学真正被国际心理学界所接受，实实在在地为全人类服务。中国心理学与其它学科一样，就像一颗大树，而曹日昌教授的领导风格与学术成就，正像是大树的根，滋育着中国现代科学心理学的各个领域、各个分支茁壮成长。

坚持真理，忍辱负重的学者

——纪念曹日昌先生冥诞100周年感言

北京师范大学 章志光

曹日昌先生是我很敬佩的学者。他是建国初我国心理学界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平易近人、学识渊博、坚持真理、勇于实践，是敢于承担责任的共产党员与心理学家。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他刚从国外回来在中国人民大学作学术报告，那是1951年，我还是一个研究生、听众。这个报告不仅介绍了国外，尤其是前苏联的心理学研究动态（如关于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的学说及两个信号系统的论述），而且强调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以及毛泽东的“实践论”指导心理学研究的必要性。这个报告给予我们这些年轻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以极大的启发，并开始立志为我国心理学的建设与发展贡献力量。

让我最为感动的是他在1958年“心理学批判运动”中的表现。当时，由康生操纵和北师大部分师生发起的学术批判活动，把心理学说成是“伪科学”。批判者们说：毛泽东讲“在阶级社会中，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为什么心理学中讲思维甚至感觉、知觉都是人类共同的而没有阶级性？比如大粪，知识分子感到它是臭的，而农民觉得它是香的，这不是阶级性是什么？所以，心理学在宣扬超阶级的人性论。（这些论调已荒谬到了对人类感觉的怀疑，是对唯物主

义反映论的不信任与歪曲，是反科学的）当时，曹先生是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副所长，他与其他前辈们一样，在这场风暴中首当其冲，受到了批判。当时，谁要是说心理学是科学就要受到批判甚至斗争，全国心理学处于崩溃边缘。

曹先生采取了几项对策：

第一，坚持自己的观点，顶风挺立。他不像有些人见风使舵都纷纷表态说“心理学是社会科学，是有阶级性的”。曹先生从1959年发表“心理学研究什么”起，不止一次地说：“从辩证唯物主义看来，心理现象是脑的机能，是客观现实的反映”，“任何一种心理活动，都可以区分它的内容、过程和机制或生理机制三个方面。人的思维，即思维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阶级意识的制约，具有阶级性。毛主席讲的是“思想”，指的是思维的内容，当然是对的。但心理活动如思维的过程和机制是人类长期的历史发展的产物，并不随当前的社会生活条件的变化而立刻变化，对每个健全的人都是一样的。心理学研究对象是心理过程和个性特征形成过程。而心理内容则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其它有关科学的对象，不属于心理学研究的范围。”这些思想也是1959年他在青岛

疗养中接见我时的谈话内容。后来反映在他主编的《心理学》一书中，它对纠正58年大批判和否定心理学的错误以及确定我国心理学正确的研究方向具有极重要的影响。

第二，利用《心理学报》阵地，组织心理学家们写“心理学与自然辩证法”的论文，其目的是向社会各界表明，只要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开展心理学的有关研究，其结果就可以为批判二元论或唯心主义服务，为现实服务。我们当时就是响应这个号召，1959年参加了科学院由于光远、曹日昌同志主持的这方面的编写活动。如朱智贤教授写的“儿童心理的发展”和我写的“素质与能力”等文章，刊载于《心理学报》1961年第1期。这些研究和论文是对1958年批判的一次反批判，它说明心理学的科学性与思想性是一致的，从而对于坚定心理学的正确方向起到重要作用。

第三，通过向组织反映以达到拨乱反正的要求。这场规模浩大的运动是通过基层组织发动的，它只有经过向上级反映情况才能解决问题。曹日昌同志团结党内外的心理学家及学者多次向中宣部陈述意见，终于弄明白这是一场把学术争鸣与政治运动混淆的偏差，最终得到了平反，并通过百家争鸣实现了心理学的平稳发展。

曹先生还有许多优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比如，他强调继承优秀成果（如艾宾浩斯的记忆研究）与开创性研究（如间隔学习和集中学习的研究）等等。他是我国研究记忆的心理权威和研究创造性活动的首创者，最为可贵的是他还亲临工厂、学校、部队、医院等实际部门开展心理学工作，对促进心理学应用研究和生产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心理学界有了曹日昌先生是中国心理学界得以持续发展之福，曹先生虽然逝世有40多年了，而他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们心中，他不畏强权、坚持真理的精神永垂不朽！

2011年5月18日



怀念曹日昌先生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张瑶

2011年1月11日是我国现代心理学家、心理研究所原副所长曹日昌教授诞辰百年日。回想起曹日昌先生治学严谨、待人亲切和蔼、诲人孜孜不倦的笑貌和作风，宛如就在昨天仍清晰栩栩在眼前。

我是1957年9月，从复旦大学生物系生理专业毕业分配进所的。曹先生是我接触到的第一位心理学家、心理所的领导人。由于我是非心理学专业的学生，不知未来在所如何适应心理学专业工作，怀着忐忑的心情去见曹先生。他不愧是心理学家。他看出我紧张不安的心情，却是那样亲切和蔼地询问我：“生理专业都学些什么专业课程？”我回答说，有生物化学、物理及胶体化学、生理学、内分泌学、高级神经活动生理学和中央神经系统生理学等，这些课由系生理教研室的老师讲课。生理教研室主任是卢于道教授，卢先生是我国大脑解剖生理学先驱。高级生物化学、电生理学则是校方请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的专家来校讲课，如生化专家王应睐、曹天钦教授讲蛋白质部分；邹承鲁教授讲酶部分等。生理专家刘育民、张香桐等教授讲电生理学等。曹先生听后点头说：

“你知道吗？卢于道教授和张香桐教授他们从前也是学心理学的。”继之，他又问：“你是怎样想到来心理所工作呢？”我答，

毕业前夕，生理教研室秘书包正先生到毕业生宿舍了解各人未来工作设想，我对包先生说，我对高级神经活动生理学有兴趣。大三年级暑期生产实习时，我被分到生理生化所实习（当时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尚未分开成两所），我们同学有人分到生化；我分到生理所跟着徐秉煊老师实习，做条件反射和胃瘘建造的实验工作。大四毕业论文是在卢于道先生指导下进行。我希望有机会今后能进行这方面工作。当毕业分配方案公布有心理所要两名毕业生时，我填了心理所，最后就被分配来了。其实，这时的我对心理学和心理所的工作对象及任务是一无所知。曹先生听后说：“解放了，新中国建设需要心理学，心理学要大大地发展，现在心理所建所了，今后也会要大发展，社会需要心理学，心理学学科的发展需要多学科，多方面的人材共同工作。心理是脑的机能，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而脑就是心理的器官，这个黑箱子现在尚未打开，它需要心理学、动物学、生理学、医学、遗传学、哲学、教育学，还有数学等方方面面的人共同努力……。”我有幸倾耳聆听着对未来心理学发展前景描绘出的宏伟蓝图，开始有了点信心，愿意将自己毕生的精力贡献给心理学事业而努力。曹先生是我进行心理学工作的启蒙良师。

以后，我被分配到副所长丁瓚教授领导下的医学心理组（室）工作，曹先生是副所长兼感知和劳动心理组（室）长，我和曹先生不在一个室组工作，但我仍然能感受到曹先生对我们这些年青人的爱护和关心。1958年7月的一天，我正在办公室看书，他过来将我叫到他的副所长办公室，他告诉我说，上海大众医学杂志来函约稿，拟要一篇有关神经衰弱方面为内容的稿件，他考虑由我执笔撰写，并告诉我，科普内容的文章面对的是非专业的读者，它更需要内容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先可以查资料，然后动笔写，写完之后再给他看。这是曹先生教我如何着手工作，手把手的领我进入科研工作之门。当我写完送曹先生审阅时，他问我为什么用神经衰弱与心理因素关系为题，我作了解释。大意是说时下在谈到神经衰弱时，仅提到以药物治疗这样单一的治疗方法是不够的，应重视心理原因，针对它开展心理治疗等多种治疗。曹先生建议，使用多种治疗结合的表述不如使用综合治疗更为合适。这篇文章经过他修改后寄出。从这件事情，我体会到曹先生对年轻人的培养是多方面的。

生活中，曹先生也是关心职工，经常和大家融成一片。只要所长们有空，他们会尽量参与所内各种活动。记得那是1959年春夏之交，许多花木争相吐艳。团支部和工会联合组织职工去颐和园游览。当天，丁瓚副所长因身体欠佳未能前往，而潘菽所长兴致勃勃地背上相机，和曹日昌副所长、党支部书记兼副所长并工会主席的尚山羽同志与我们一起参加了游园活动，还和职工（家属）一起合影（图1）。当医学心理组的群众提出要和三位所长们合影时，他们欣然同意，这是

多么宝贵、难得的“全家福”啊（图2）。



图1：1959年所领导与游园同志合影留念



图2：1959年所领导与医学心理组合影留念

当十三陵水库修葺完毕，所里又组织大家畅游十三陵水库。这是1960年秋天。当天，天气虽晴但风却较大。曹先生携夫人和儿子曹增义、女儿曹何丽一同前往，和我们一起兴趣十足地游玩。当走在水库坝顶时，到来众多游人驻足观看，因为曹夫人是荷兰籍女士，曹夫人就故意落后在我们人群中，而他们活泼好动的孩子们，都穿着戴帽风衣，跑上大坝围栏上，跳着、走着，高兴而不惧高，这也引发了曹先生的未泯童心，随着孩子们步上围栏。可我们这些尚是青年的男女们，却无一人敢走上围栏，大约一是墨守成规，或是恐高症作怪。最为遗憾的是镜头前缺失了曹夫人的倩影，这真是美中不足啊！

转眼到了1962年国庆佳节。国庆节第二天的下午，我和同寝室室友张梅玲女士一道前往天安门广场。我们正巧看到曹先生也正在广场上独自一人在游览。我和梅玲当即拥

.....

向曹先生身边。他平易近人且善解人意。他看出我们有意与他合影，当即满足了我们的愿望。并在天安门城楼、人大大会堂、历史博物馆、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等处为背景，和我们拍了合影。

过去，我曾听所内同志说，曹先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在香港任教时，他曾接受党组织的委派，做了许多知名人士及海外留学生回归祖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的联络工作。最近，我读到由涂元季、莹莹著的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钱学森故事》一书（北京青年报转载，2011年，3月14日，C版，以系列内容刊出部分该书内容），作者写到，1949年5月14日，曹日昌教授给正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读博士的葛庭燧先生去信，请他代为转寄一封给钱学森教授的信，信中，曹先生是受党组织委托，向钱教授表达了即将建立的新中国母亲的召唤。信是这样写得：“尊敬的钱学森教授，我受即将解放的祖国之托转

达对您的殷切期望，新中国百废待兴，太需要您这样杰出的科学家了，期望您——世界公认的力学和应用数学界的权威，卓越的空气动力学家，现代航空科学与火箭技术的先驱和创始人回归祖国的怀抱，领导新中国的航空工业建设……”。葛先生在收到曹先生的信以后，也给钱学森教授写了一封信后一并寄出。钱学森教授收到这两封同时到达的信，反复读着两封信。从这段文字述说中，我们知道这个曹日昌教授就是咱们心理所的曹先生。他为党工作热忱并忠诚而不留声，这就是曹先生的人格魅力。我们看到钱教授记得您，人民也记得您，葛教授也记得您给予他人帮助与关怀的联络工作。我仅借作者谈及的这些内容向钱学森教授致敬，它更加深了我们对良师曹先生的怀念。心理所、心理学的后辈们也不会忘记您——曹日昌教授。

值得我一生怀念的人

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 段蕙芬

曹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四十多年了，可是他的音容笑貌却经常闪现在我的眼前，他在学术上的严谨、创新、民主开放以及人格魅力更是时时影响到我的研究工作乃至我的一生。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1960年）我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分配至中科院心理所，就在曹先生的指导下从事着研究岗位上的有关工作，直至“文化大革命”中先生被批斗、关押、隔离审查。在这六、七年的时段里，就他对我及其他年轻人的培养谈些个人的体会。

我们国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及人为因素造成的困难，到了1962年提出了“整顿、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和全国科研机构一样，心理所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系统的研究工作。这时第二研究室“记忆组”在曹先生的带领、指导下成立，我很幸运地成了其中的一员。先生不仅以他对国际上这一领域的研究前沿的把握，开创性地开展了记忆心理学的实验研究，在不同感觉通道（视、听、触、运动）的方向上进行着各项探索，同时又非常重视结合中小学的教学实际，研究学生的识记过程和识记方法，以提出改进青少年记忆方法的教学指导。我正是被安排在这一研究

方向上。虽然研究的思路、框架是曹先生提出的，但他充分发挥年轻人的自主精神，要我们深入教学第一线去听课，总结教师的经验。自己寻找实验材料进行科学实验，并对实验所得资料加以归纳和总结，以此培养了我们独立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更令我感动的是：在参加“四清”运动下乡后，曹先生还在我完成实验、材料初步整理总结基础上，亲自组织组内其他人员一起深入分析，加以提炼、修改成文，并以我为首的名义发表于《心理学报》（1965年第一期）上，这就是那篇“初中学生的识记方法：文言文和白话文的识记方法与过程”。对于一个刚踏上工作岗位不久，开始从事正规研究工作的年轻科研工作者来说，这一整套严谨地科学实验程序和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对于年轻人的关怀、指导和培养，确实是我一辈子受用不尽的财富。这在我以后无论从事学习和记忆的生理机制的研究，或者在教学科研道路上对学生的学习、记忆研究指导都带来深远的影响。我也常常以曹先生为榜样，真诚、悉心地关怀、爱护周围的同仁和年轻人。

不仅对我是这样，对“记忆组”内的其他人也是如此。我们组内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独立的研究方向。我因一度曾被曹先生

.....

指定为组内召集人，协助他做些具体工作（这其实也是对我的一种培养）。记得几乎每周都要召开组内会议，内容是各自汇报科研进展，相互交流、取长补短。他是以一种学术自由讨论的方式来提高年轻人的科研能力和水平。既培养了各自的独立研究能力，又要求从整体方向上把握各课题研究之间的联系，提高了宏观层面上的理论水平。这样的学术民主讨论方式也为团队精神提供了基础，如需要时相互帮助收集、整理、分析实验资料等等。

对年轻人的关怀、培养还表现在他对《心理学报》来稿的处理态度上。刚进心理所时，我曾在他主编的《心理学报》编辑部工作，曹先生不仅放手让我初审来稿并嘱我要认真对待每一份来稿。只要经编委审阅后尽量能修改发表的就给予机会，不要轻易退稿处理。在编委会议中曹先生以极强的组织能力，在充分听取各领域专家编委审查的意见讨论后最终达成共识。开会时曹先生总能营造出一种极其民主的学术讨论氛围，这种和谐的学术民主氛围也是我一辈子难以忘却的。回想在以后岁月中遇到的学术上以势压人、门户之见甚至不惜手段结帮拉派、人身攻击，背离了学术上的百家争鸣和纯洁，影响了年轻人的成长，更影响到了学术上的发展提高。对比那时的情景是多么值得借鉴和发扬，多么地难能可贵啊！

曹先生为人淡泊名利，除了表现在文章署名尽量推出年轻人，推出实验研究者外，据我所知，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的稿费，他都是作为党费上交给组织。曹先生为人坦

诚、正直，坚持真理，讲真话，在任何压力下都不违背这个原则。作为解放前的地下党员，他接触与联系过不少学者、知名人士和地下党员，但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日子里，经过他手所写的外来调查材料，总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写得一清二楚。他清晰地思辨能力和惊人地记忆力使他所写的内容如同刚刚发生一样。对所反应的材料客观、公正，从不为外来压力所屈服，从而使不少受迫害的同志还他们以清白和公正。在文革这样的恶劣的环境下做到这点是多么的不易。没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和崇高的品德是不可能有这样的表现。这样的共产党员是值得我敬仰并一辈子学习的榜样。

曹先生在文革中因受迫害被肝癌夺取了生命。在他不到六十岁的壮年期能为国家为中国的科学事业、为心理学的发展发挥他巨大的光和热的时候离我们而去，至今仍感到惋惜和痛心，对心理学界确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由衷地感谢曹先生给予我这一辈子人格和学术上的影响，在纪念曹日昌先生一百周年诞辰的日子谨以此文寄托我的深深怀念和感激之情。

2011年4月24日

学习曹日昌心理学思想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郑和钧

1963年我有幸考取了曹日昌先生的研究生。头两年主要是学习基础课，与导师接触不多。65年下半年去农村搞“社教”，回京时，“文革”已经开始了。在“文革”中曹先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我被打成心理所的“保皇派头子”，师生不能接近。68年5月，研究生制度被作为“修正主义制度”取消了，全国所有的研究生都作为“修正主义苗子”，一律下基层劳动改造，我被分配到吉林市一所半工半读学校当教师。我离所时，也没能向导师告别。“四人帮”剥夺了我向导师学习的权利和机会，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文革”结束后，直到1978年11月我才知道曹先生早在69年就被“四人帮”迫害致死，我十分悲痛。在纪念曹日昌先生诞生100周年之际，我重温曹先生的部分著作，反复思考，收获巨大。我深感曹先生心理学思想十分丰富、深刻、宏大、远见卓识，他的心理学思想对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心理学要研究意识，特别是自我意识。曹日昌先生反复强调说：“心理学必须解决人类认识的问题，人类如何认识客观世界和如何认识自己的认识……认识自己的认识是认识的最高成就。”^[1]自我意识是人

对自身意识的意识，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所在。“自我意识是人格的核心，也是人的心理和整体素质的核心。它是人与自我、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之间及其相互关系的调节者，它影响着人自身的和谐以及人对自然和社会的适应力，影响人的创造性的发挥，进而影响整个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2]“近30年来关于‘自我’研究的专业文献浩如烟海，仅以1979年这一年而论，国际资料索引《心理学文摘》‘自我概念’、‘自尊’、‘自我评价’和‘自我知觉’这几项栏目中，就载录了1000多种学术论著（1969年只有约400种）。”^[3]有统计表明：“用关键词‘自我’检索Psychinfo数据库，结果找到相关的文献153000篇。近30年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中与关键词‘自我’相关的文献就有2000篇，……占1969—1998年这一时期该杂志总文献的35—40%。”^[4]可见，国际心理学的发展方向与曹日昌先生的预见是一致的。然而我国心理学受“四人帮”的摧残，在“文革”中停止了发展。“文革”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这种影响的后遗症还没有完全消除。笔者对我国1981—2006年底出版的八种主要心理学学术刊物，和部分心理学学术会议的论文题目进行了统计分

.....

析，其中有关“自我”的文献1981—1990年共44篇，“自我”占总文献的比例为1.4%；1991—2000年共121篇，占总数的5.2%；2001—2006年共750篇，占总数的9.6%；总共915篇，占总数的6.9%。我国的人口占世界1/5，而“自我”的文献只占全世界的1/153，简直是天地之差。^[5]为什么差距如此之大呢？为什么中国心理学不是按曹先生的预见去发展？除了“文革”的影响外，还有什么原因呢？这是值得深思的！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心理学很难改变落后状态，更谈不上在前面领跑。心理学要为建设和谐社会和创新型国家服务，就必须加强自我心理学研究。因为自我和谐是心理和谐（心理健康）的基础，而心理和谐又是社会和谐的精神基础。

二、重视研究创造心理。早在1959年，曹日昌先生就十分明确的提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根本途径是技术革命。促进创造发明，推动技术革命是劳动心理学的中心任务。”^[6]他大力支持创造思维、创造活动方面的研究，并且亲自总结我国劳动心理学在这方面研究所取得的宝贵经验。当今，人类已进入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的本质就是创造。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创新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知识创新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要素。”^[7]根据曹日昌先生的思想、心理学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伟大事业中是大有可为的。然而近三十多年来我国心理学工作者中像曹日昌先生那样既充满爱国激情，又富有创造心理学研究成果的人太少。创造心理学研究远远落后于建

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

三、重视发展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研究。曹日昌先生说：“一个人从一个自然的实体（初生婴儿）到成为社会关系的总合，正是整个的心理形成、发展的过程，是心理学应该研究的重大课题。”^[8]我国在发展心理学方面的研究是富有成果的。“文革”后，朱智贤教授主持的国家重点课题《中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发展与教育》在发展心理、人的社会化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刘范先生组织的团队对儿童认知进行了大量的有成效的研究。在他们的带动下，一大批中国心理学工作者积极投入到发展心理学研究中，取得了大量的成果，为教育教学工作的科学化提供了心理依据。曹先生早在1965年就预见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个人需要掌握的知识技术，天天增加，而学习的时间有限。如何使学生以有限的学习时间掌握丰富的科学知识，这是当前教育心理学应当进行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9]7年后，即1972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提出了“终身教育”、“学习化社会”、“学会学习”、“教育平等”、“自学”、“自我教育”等一系列重要概念和全新教育理念，成为当代教育思想发展的里程碑。它表明全世界的教育在大发展。而我国当时正在搞“文革”，“四人帮”高喊“知识越多越反动”，推行愚民政策，“读书无用论”之风刮遍全国，教育、文化遭摧残，心理学是重灾区，曹先生的远见卓识无法变为现实。“四人帮”倒台后，党中央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心理学也迎来了

科学的春天。卢仲衡先生主持的《数学自学辅导教学实验》和刘静和先生主持的《现代小学数学教学实验》率先在全国开展教学改革实验，对全国教育科学研究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随后许多心理学工作者自觉投入到教育教学实验中去，在探索高质量高效率学习心理和教学心理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有力地推动了素质教育的发展。进入新世纪、中国共产党提出要建设“学习型政党”，以促进党的建设科学化，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从而推动中国学习型社会、和谐社会和创新型国家建设。这为心理学服务社会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

四、重视将先进科技成果用于心理学研究。

早在1959年，曹日昌先生就明确提出：“现代信息与控制论理论、电子学、自动与遥控技术、电子计算技术等，为模拟脑的活动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心理学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以现代科学技术模拟脑的活动的研究，应当成为心理学的一个领域。”^[10]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国家对心理学的重视并加大投入，曹先生的愿望正在实现。高科技的核心是高智能，在社会智能化的进程中，心理学大有可为。随着网络的普及，计算机网络在心理测验、咨询、数据收集和统计分析，远程教学等许多方面发挥着威力。然而，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它的负面效应也在显现。当前，由科技革命引发的社会革命对人的心理的巨大影响，是心理学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将人类带入‘饱和社会’……‘自我植入’的后果是人将同时拥有‘多重心灵’……现

代文化意义上的稳定而统一的自我将不复存在。”^[11]心理学研究的对象——人的心理变得异常复杂多变，心理学研究将面临许多新的严峻的挑战。

五、重视合作研究。1959年曹日昌先生提出：“心理学的研究任务大，研究的问题复杂，必须多路进军，由有关的单位协力进行。各单位按其业务性质与特点，安排重点工作。例如心理学的教学单位可多联系教育实际和从个体发育方面进行意识的发生发展研究。专业研究单位的工作重点则可放在意识的起源发展和反应过程与机制的研究等。各单位有明确的分工，又有密切的协作。这样各路围攻，心理学这个坚强堡垒一定会被我们攻克、占领的！”^[12]这充分表现了曹先生作为中国心理学的领军者的宏大战略设想和精明组织管理才干。他那充满自信的战略设想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广大心理学工作者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强烈愿望。“四人帮”倒台后，科学研究的春天到来了，中国心理学工作者的激情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出来，大家齐心协力合作研究。朱智贤教授领导国内上百位心理学家承担了跨“六五”、“七五”规划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发展特点与教育》，刘范先生等组织全国十个地区的十九个机构50多位心理学家研究儿童数概念，其他如数学自学辅导教学实验、现代小学数学教学实验、超常儿童研究等都在全国范围组织了合作研究。合作智慧多力量大，这些研究团队都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令外国同行感到震撼。实践证明，合作研究

是中国心理学尽快改变落后面目，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为祖国富强做出贡献的必由之路。

冷战结束后，“和平、安全、发展、合作”是全世界人民的迫切愿望。科技迅猛发展使人类进入了经济全球化时代，人类面临环境污染，生态被破坏，气温升高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人类要生存就必须合作，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合作的概念在演变，“合争”概念的提出，共享共赢思维的形成，标志着人类在向和谐社会艰难地迈进。合作的主体也在扩大，由人与人之间的直接联系，即“人——人合作系统”向“人——机合作系统”和“人与自我合作系统”联合并形成“综合合作主体”，人类的创造智慧像核裂变一样爆发，合作行为威力无穷。合作方式多种多样，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都在开展合作。中美合作、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合作等，启示人们：合作思维、合作行为应成为心理学研究的重大课题。揭示合作与竞争的辩证关系以及合作思维和合作行为的发展规律，以便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人类和谐与幸福。合作创造是真正的核心竞争力。胡锦涛同志号召：“要积极推进协同创新，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和政策项目引导，鼓励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建立协同创新的战略同盟，促进资源共享，联合开展重大科研项目攻关，在关键领域取得实质性成果，努力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做出积极贡献。”^[13]研究“协同创新”的心理机制和心理过程，应成为心理学研究的重大课题。

六、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决定于研究对象的性质。曹先生指出：“心理学中研究的问题，什么是有阶级性的，什么是没有阶级性的，哪里要用阶级分析，哪里不能用阶级分析，要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并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依赖于社会实践的心理现象，这也许是心理学的特点之一。”^[14]“心理学还在年幼发展阶段、任务重，能力小，研究的问题多于可用的方法，应当兼容并包，应用和创造一切可用的方法，不要局限于任何一种方法束缚自己的手脚”^[15]，把阶级分析法当作唯一的方法，或者把实证方法作为唯一的方法都是不对的。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只重实证方法，反对或忽视质的方法，重分析、轻综合，重局部轻整体，这不符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协同的大趋势，也极不利于心理学的发展。

七、坚持学术民主和学术自由、坚持真理。曹先生对1958年心理学界的学术批判运动的合理东西给予充分肯定，同时，对于错误的东西，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有理有据的分析、讨论，既坚持学术民主、自由，又坚持真理。他认为：“心理学界有可能形成不同的学派，是可喜的现象。有不同意见的心理学工作者都应当各抒己见，争鸣辩论，坚持真理，虚心学习，对各种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在研究工作中展开友谊竞赛。”为了坚持真理，坚持心理学的正确发展道路，仅在1959年这一年，他在《心理学报》上连续发表四篇文章（近4万字），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心理学的对象、任务、方法、学科性质、发展战略和策略等重

大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有说服力的论述。他作为领导,带头发扬学术民主、自由,平等待人。一位中学老师对曹日昌先生的观点有不同意见,他的《关于心理学中的自然主义观点——与曹日昌同志商榷》一文,照样可以发表在曹日昌先生主编的《心理学报》上(1966年第1期)。学术民主、自由争鸣是科学的生命。在曹日昌等老一辈心理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心理学界形成了一个民主自由的学术环境。然而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破坏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环境,将中国的经济文化推向了崩溃的边缘。“四人帮”倒台后,政治民主、学术民主、改革开放,我国又进入了繁荣昌盛的时代,心理学也迎来了阳光灿烂的春天。

五十多年过去了,曹先生的思想仍没有过时,对心理学的发展仍有指导作用。他的远见卓识令后人敬佩。为什么曹先生的心理学思想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呢?这是由于曹先生一生中认真学习、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结果。因此,我们向曹先生学习,首先,就要学习他忠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否则,很难理解曹先生心理学思想的实质。我们要像曹先生那样充满爱国和科学激情,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心理学的优秀成果,潜心心理学教学与研究,奋力开创中国心理学发展的新局面。

2011年5月14日

参考文献:

- [1] [10] [16] 曹日昌: 心理学界的争论, 北京: 心理学报, 1959年第3期.
- [2] [5] 郑和钧、郑卫东: 中国自我心理学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上海. 心理科学, 2007年第5期.
- [3] [苏] 伊·谢·科恩.论自我, 北京: 生活、读书, 最新出版社, 1986年5月.
- [4] 黄希庭等, 人格中的自我问题,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2期.
- [6] 曹日昌、李家治: 中国劳动心理学概况。北京: 心理学报.1959年4期.
- [7] [13] 胡锦涛: 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经济日报, 2011年4月25日.
- [8] [9] [14] 曹日昌: 关于心理学的基本观点, 北京: 心理学报, 1965年2期.
- [11] 杨莉萍: 社会构建论心理学,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6年12月第一版.
- [12] [15] 曹日昌: 关于心理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北京: 心理学报, 1959年1期.

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

——写在曹日昌先生诞辰100周年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张侃

曹日昌先生不幸去世已经42年了，今年是他诞辰100周年。所里决定开一个纪念会，以发扬和光大曹日昌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贡献，并寄托我们的哀思。为此，所《通讯》要出一期专辑。所办张莉副主任给我看了各位老师写的纪念文章和曹日昌先生的儿子曹增义先生写的纪念他的父母曹日昌先生和夫人色尔玛的文章。这些文章，增加了我对曹日昌先生和他一家人的认识。看到曹日昌先生生前的与人为善和突出贡献以及他一家的遭遇，我久久难以平静。张莉认为我虽然没有见过曹日昌先生，但是，担任过两届所长，又一贯对曹日昌先生有由衷的敬佩，让我也写一篇纪念文章。为此，我思考了10多天，觉得心里很乱。

我不由自主地想到，2006年，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召开了《曹日昌心理学文选》的首发式和纪念曹日昌先生诞辰95周年纪念会的情景。一些优秀的人，离开了我们，甚至是过早的离开了我们，引发我们无限的感慨和哀思，这在心理学也是一样，曹日昌先生就是这些早逝者中的一员。参加那次首发式和纪念会的人，无不为了曹日昌先生的学术建树而敬佩，无不为了他的早逝而唏嘘不已。我也由衷地表达了我的心声，后来被当年的《心

理学报》刊登了。那时的点点滴滴，宛如昨天。短短5年过去，参加那次纪念会的一些先生，已经作古。真是人生苦短，世事无常。人，无论贡献大小、善德差异、高低贵贱、年寿长短，都是要走向共同的归宿的，概莫能外。如果说人类社会大同还遥遥无期的话，在这最后的归宿上，人类早就大同了。只不过世人对此的认识还很不认真，很不到位。

2006年以来，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和心理学同仁的努力之下，由《曹日昌心理学文选》为首卷，已经形成了《中国现代心理学家文库》，出版了十多位学界公认的德才兼备、对我国心理学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的中国著名心理学家的文选，文库还将继续出版下去，为中国的心理学留下一套经得起历史考验的集中国心理学和心理学人大成的精品。我想，冥冥之中的曹日昌先生对此一定是有所欣慰的。

我对曹日昌先生的了解是通过老一辈心理学人的口传和一些文字材料。曹日昌先生诞辰于1911年1月11日，同年，中国发生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267年的残酷统治。1921年，曹日昌先生10岁，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心理学会成立。如此，今年还是

辛亥革命100周年、中国共产党90周年和中国心理学会90周年。从先生的生平看，他热切地投身了中国近代科学救国、留学求知、革命救亡、推翻民国、夺取政权、社会改造、以俄为师、抗美援朝、科学跃进等一连串的重大变革，成为我国知名的科学家和科学部门的领导干部。他最终在文化革命中受到野蛮的迫害和残酷的精神虐待，而早逝于1969年3月14日，享年仅58岁。1978年中科院恢复研究生招生，心理所招收了第一批10个研究生，我有幸成为其中之一。从那个时候以来，所有对我提及曹日昌先生者，无不表达敬重和惋惜，可见，曹日昌先生始终活在后人的心中。

恒古以来，逝者不可计数，后人为什么只是纪念其中的一些人？仔细想来，对前人的纪念无非是三种：一是纪念其生，犹如对鲁迅；一是纪念其死，犹如对鲁迅写过的刘和珍君；还有的就是既是纪念其生，也是纪念其死，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一类的，最典型的是对屈原，他生有重大贡献，给我们留下了千古不朽的诗篇，他死得震撼华夏，表达了崇高的爱国情操和伟大人格，甚至还给我们创建了端午节。我觉得，我们对曹日昌先生的纪念，也是既要纪念其生，又要纪念其死的。

曹日昌先生给我们留下最深刻的记忆是和陆志韦、丁瓚二位先生一起，创建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很复杂的。中国的科学院，过去叫中央研究院，蔡元培先生当过院长，并建立了心理研究所，这从心理所所史能看的很清楚。49年发

生了大陆政权的更迭，50年又重建（恢复）科学院，本来就应该有心理研究所，因为，中央研究院并没有将心理所带到台湾去，而其，一直到今天，位于台北的中央研究院也没有心理研究所。只是，恢复中科院的一些领导还没有看到心理学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还没有看到心理学是整个科学体系中必须具备的必不可少的部分。丁瓚先生和曹日昌先生当时身处科学院领导机关，自己又都是心理学者，自然地要恢复心理研究所，不过，那个时候不好叫恢复，而是叫成立。据说，恢复心理所的事，郭沫若老院长是很赞成和支持的，他毕竟是科学大家，见多识广，高瞻远瞩。而其他一些高位者则颇有微词，似乎曹日昌先生和丁瓚先生二位为了自己学科的方便。好在50年代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明确的所的级别的规定，曹丁二位的官位还在中科院的中枢机关，不存在为了自己谋取官位的问题。后来研究所就有了级别了，为了避免异议，曹日昌先生很策略地将心理所改成为心理室。那个时候，反对者不好说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学科获得更多的资源而不同意有个心理所，而是说心理学的人才不足以成立一个所。直到1956年，在潘菽先生和全国心理同仁的推动下，中央才下达批准文件，正式成立了现在的心理研究所，曹日昌先生担任了副所长，又参加了一次建所。以上这些，都是听荆其诚先生亲口对我说的，他是在50年获得硕士学位后就来参加筹备心理所的，当是第一手的回忆。我所见到的其他回忆和批示文件，与此也能互相印证。后来，从2009年起，按照科学院的指

.....

示，我们已经恢复了历史的原貌，心理研究所始建于1929年，后来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如果没有包括曹日昌先生在内的老一辈心理学人的努力，现在心理所是个什么样子，很难假想。在纪念曹日昌先生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这样一个历史的过程。

作为一个心理学和心理所的后来者，我对曹先生最为敬佩的还是他对心理学学科的精辟见解和辩证唯物论的学术思想。每次重读曹先生的论文“心理学研究什么？”（发表于《心理学报》1959年第4期，收入《曹日昌心理学文选》，第367页），都会由衷地折服于曹先生对心理学系统的见解。他的学术思想和提出的理论体系至今仍然是我所读到过的在我国对心理学的本质、定义、任务和研究方法最重要的理论总结。在这篇论文中，曹先生首先明确，心理学以研究意识的起源、发生和发展作为学科的目标，从生物进化的角度看待这些问题。接着他指出，人的心理是人对客观现实的反映过程。突出地指明心理学必须研究脑的功能，还要和生理学等学科合作来研究。他点明了人与脑的关系，脑是思想的器官，但是，心理并不仅仅是脑，离开了人和人的全身对外界的反映，就无从研究人的心理。在第三节，曹先生论述了人的意识活动的特征，并旗帜鲜明地指出人的意识的共性和带有阶级性的意识的个性之间的关系，认为“如果只承认共同规律而不承认个性和阶级性，那是极端错误的。认为个性是心理的主体，它决定一切心理活动，阶级性是心理意识的核心，它调节支配一切心理活动，这种说法也是值得商榷

的。”在那个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意识形态扭曲的年代，能够有如此的真知灼见，并以公开论文发表，是何等的难能可贵，何等的勇敢而执着！而且，我认为，字里行间透露了，那个时候，是有人要以阶级性来“统帅”心理学研究的，否则，曹先生且不是无的放矢？自说空话？联系到，直到今天，还有一些试图以个性取代共性的看法，遗传决定一切、性格决定命运等等，如果在那个时候有些人试图从共性上抹杀心理学的科学性是不足为奇的。然后，曹先生指出，研究方法决定于研究对象的性质，全面论及观察法、实验法、生理法、模拟法、信息论、控制论、遥控法、电子技术等等在心理学研究中的作用和意义。最后，曹先生彰显了心理学的哲学、科学、现实意义，并提出，心理学是对人的认识的认识这一精辟而完整的心理学的基本定义。

上述这些重大理论问题，直到2005年《科学》杂志在总结今后25年最重要的科学问题时，还在提出，并得到全世界科学界的一致认可。而曹日昌先生的论文，比《科学》杂志的总结，早了45年！人类历史是以百年和千年来刻度的，科学的进步是以10年和5年来分代的。曹先生对心理学本质的认识，比科学杂志早了好几代！可以设想，如果我们中国的心理学能够有曹日昌先生的继续领导和指导，就会避免很多的混乱和弯路，一定能发展的更好。然而，事实不容假设，曹先生就是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曹先生的过早离世显然与在文革期间受到的冲击和迫害有关，甚至在文革前，也

有很多隐约的令他抑郁的情况、事件和环境，这在我所的所史中都有所表达。中华民族有很好的历史经验，以史为鉴、前车之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往日之事今日之师等等。对待曹先生和他一家的受到的迫害，这些事，过去了就过去了？如果对任何的恶行，过去了就过去了，今后在某些条件出现时，类似的恶行势必还要发生，那么，过去的人且不是白白地过去了？窃以为，我们需要深刻的反思，而且这个反思不只是情感的冲动，更是理性的思考。情绪只能宣泄于一时，只有理性的思考，才能提高认识。

人类为什么互相残害？在残害别人的过程中，为什么有的人更加凶暴？有的人在看到别人残害别人时，为什么会无动于衷？这些涉及到人类行为的问题早就引起了国际心理学界的关注和研究。然而，他们归结于责任分散的说法，即在有人受害的场合，如果有很多人在场，多数人会倾向于认为，别人会来管这个事，自己用不着去管，故而表现为没有积极主动去管，我觉得还是太简单了一点。前几年，我去日本开会，日本人对《三国》特感兴趣，正好那几天中国电影《赤壁》在日本上映，轰动日本列岛。一位日本心理学家问我，在古代，双方怎么能动员几十万人互相砍杀？我无言以对，心想，日本侵华，那么个小国怎么能动员上千万的人投入战争？战争是天皇和军国主义内阁发动的。但是确实是日本人民执行的。没有日本人民的热情投入，几个军阀能打成那么大的战争吗？现在我们能看到很多的记录片，每当日本皇军占领中国一个城市，日本人民

都是兴高采烈提着灯笼上街游行庆祝的。日本侵华造成中国人死伤3500万，其中死亡1800万，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整个日本民族对中华民族是有罪过的。日本人至今也不正式承认和道歉，这成为中日关系中最不和谐的因素。

世界进入近代以来，受民族利益的天然优先性和狭隘的民族利益观的影响，世界各个强国，无一不想掠夺中国，而富裕自己。八国联军就不用提了，就连号称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前苏联，也在1945年从我国东北抢走价值20多亿美元的财富，还试图乘机控制东北，甚至还要当时的国民政府为苏军出兵东北预先买单！正如孙中山为发动革命所呼吁的那样，中华民族在很长的时期内，始终处在“亡国灭种”的阴影之下。这种阴影一直到今天还没有消散。君不见，我们的国歌每次都在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们，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最危险啊！最后的吼声啊！这种死亡的威胁，使得所有的人都会产生消灭敌人的冲动。一旦有人，特别是有权势的人，以死亡来威胁普通人，告诉其对手是要你死亡的敌人，普通人为了不死亡，是很容易做出一切可能的事来维持自己的不死亡的。人是一个完整的全体，他不可能对待外敌是一种行为模式，对待国人中的“敌人”是另外一种行为模式。人的统一性，在这里就非常容易地转化为对他人的敌对。从行为的动机看，窃以为，只要一天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民族还在这种死亡意识的笼罩之下，其做出残害别人的行为都是非常容易发

生的。这里的底线是“自保”，你能不允许别人自保吗？你有什么办法让人在自保的过程中小心谨慎、循规蹈矩、温良恭俭吗？我以为，不可能！只有摆脱死亡阴影，拥抱幸福人生的人，才可能对行为有更多的理想和思考。除了看清首恶者是恶性之源，我们还要认识到，在所有的恶中，参与和旁观者也是恶的帮凶。诚如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中所写的那样，北洋政府屠杀了40多个手无寸铁的青年，却说她们是“暴徒”，于是参与杀人的人，就以为是为杀对了，不以为耻辱，“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其实，要知道，以围观为乐者身上被沾污的血迹也是怯弱和羞辱的印记。在死亡的威胁下，很多普通人被迫做了为虎作伥的事，固然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实际原因，但是，这绝不是将所有的责任都推给看不见的地方的理由。所有参与文革中的活动的人，包括我们这些当时虽然不在心理所，但是也在其他的地方响应了“号召”的人，都需要自我救赎。只有如此，方可避免未来类似悲剧的发生。对于在文革中受到迫害而逝去者，对于在文革中受到其他迫害者，整个中国人都是有责任的。对在心理所被受到迫害者，我们心理所的当时的人都是有责任的。甚至有些被迫害者也是有责任的，因为他们也参加过更先对别人的迫害，为那种文化和惯性增加了力量。我们只有对过去进行深刻反省避免新的悲剧，才能有更好的进步。

正如曹日昌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人与人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就在昨天，我参加了

“林仲贤先生追思纪念会”。林先生是我上面提到的参加过“《曹日昌心理学文选》首发式暨纪念曹日昌先生诞辰95周年”会议中的一位。他6月3日，突然去世了，享年79岁，大家对于他的突然离去和生前的种种好处，无不感慨万分。有一件事，没有人提到，不久前，所党委李安林书记找他了解我所文革期间的一些情况，因为他是没有参与到任何活动中去的，他给了党委很多的帮助。算起来，林老师是1955年到心理所工作的，到文革的时候，他已经来所11年，年纪也只有35岁，正值壮年，按孔夫子的分析，是容易“好斗”的年纪，他为什么能不卷入那时的乱象？各类事件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不少不被卷入的人，或者即使被被动卷入但是采取非常与人为善和温和态度，而与那些穷凶极恶的人形成巨大反差的人。

“人的心理是人对客观现实的反映过程（曹日昌）”。行为背后，必有动机；动机的存在，必定有心理基础；心理的基础，必定是其客观现实的造就。如此，我们就可以看到，凡是在青少年时期受到过某些压抑的人，他们成年后的行为常常向着“穷凶极恶”看齐，对他人表现出更多的敌意和恶性，甚至多疑，有被迫害的臆想，表现为不必要的过度的反应，做一些害人而不利己的事，即便他个人已经身居高位、衣食无忧，但是还是不能善待他人，在其行为时，很难看到其直接动机，这在中国的历史上，如此情况处处皆见。国人总结为，奴才做了主子比原来的主子更凶狠，是因为这些原本的奴才对奴才们如何反抗太了解了。其实，都是

一种心理的变态，青少年时期的心理损伤，这一客观现实必然造就如此之心理，导致如此之行为，这自然不能简单地怪罪于他们，而是要看到客观现实的影响。我们要努力改变客观现实，不要让下一代的人再受伤害。但是我们不能完全消极地等待，作为我们自己，要牢记“与人为善”是做人的根本，一切与之相反的行为的理由只不过是心理变态的自我解嘲。在这个仍然充满了恶的世界，唯有“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才是为人立足之道。

穷凶极恶是说恶的极端性，但是仔细看看先人的智慧，就可以看到其中符合心理学理论的道理。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都太穷了，必然造成对社会（也就是对他人）敌视的心理，进而表达为极端的恶行。我们仔细看看，难道不就是这样吗？穷是万恶之源，穷出盗贼人人皆知。当今，有识之士大力呼吁，要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根源只能是让全世界的人都过上幸福的生活。所有这些，都是同样一个道理。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只有让儿童和青少年有个健康成长的环境，他们才不会在后来以不良心理来对待他人。

中国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的封建王朝，每一个王朝建立之后，他们大多数是在统治者

之间的你争我斗，很多时候对普通民众来说是天高皇帝远。只有清朝，留发不留头，其统治的触角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封建王朝，自其统治中国以来，中国人民有300多年在贫困线和生死线上挣扎。只有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才使得我国的国力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极大改善，中国人民能渐渐地扬眉吐气，享受幸福的生活。那些过去侵略过中国，看不起中国的地方，也欢迎中国人去了，甚至央求中国人去了。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场景，这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艰苦奋斗90年才取得的成果。但是，我们不可忘记，中外的敌人是不甘心让我们过上美好的生活的。我们自然不能像过去那样，采取不顾一切，只以斗争的方式来应对，而是要更好地发展我们自己，让人民生活的更幸福。这正确的道路就是，“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这是国家的大政，我相信，发展下去，中国人的心理会更加善良和美好。这也是心理所要服从的道理。如此坚持下去，心理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谨以此，纪念曹日昌先生诞辰100年。

2011年6月1日

七律 缅怀曹日昌先生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方至

十载迷茫叹逝川
先生蒙难忆犹鲜
牛棚忍辱寻常事
妻室凋零最可怜
何物乌云遮丽日
人间正道雪奇冤
学人风范今肃立
更喜佳音海外传

爸爸，妈妈，我是你们的儿子

曹增义

今年是我的母亲诞辰90周年，我的父亲诞辰百年。四十三年前我的母亲在被心理所关押半年后悲惨的离开了这个世界。几个星期后我的父亲就病了，直到医院诊断是癌症才被从心理所送进医院。不到三个月，父亲就默默的离开了我们。至今为止我从来没有写过有关我父母的文章，也从来没有人请过我写文章。纪念活动我也只参加过一次，这就是1978年6月10日在北京举行的父亲骨灰安放仪式。

我父亲的骨灰在他去世后一直保存在他的家乡河北省辛集市曹家庄。1978年4月心理所突然通知我父亲的骨灰可以进入八宝山革命公墓。科学院打算举行一个骨灰安放仪式。我多次问心理所我的父亲是否平反。心理所不给任何正面答复。最后让我看了一份1973年的文件。对我说只有这一份。我当场全文手抄，文件如下：

关于对曹日昌同志审查意见的批复

(73)院政审办字第22号

中共心理所临时支部：

关于曹日昌同志的审查意见，经院党的核心小组五月二十三日讨论决定：曹日昌一九二八年参加国民党。一九三三年任国民党刊物‘教育短波’社董事，研究部主任，社长。一九四五年在昆明担任美国‘战略情报局’中国总部临时雇员等，属政治历史问题。解放后，在科学院工作期间，有过错误言论和违反外事规定的错误。属政治错误。同意恢复其党籍。

中国科学院政治部

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就凭这份文件我父亲的骨灰可以安置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如果是，为什么需要等五年？没有人肯给我个解释。

.....

举办父亲的骨灰安放仪式，心理所和科学院连父亲的照片也没有。我家先后被心理所抄了三四次，至今所有抄走的照片和文字的东西没有退回任何一片纸。我还是设法找到了我们全家1966年3月的最后一张照片，提议用这张。这是母亲去荷兰看外公前的合影。心理所同意了。不过为了我在仪式上的发言稿争论了很长时间。心理所不同意我的讲话，我是坚决不肯改动。直到我明确表示心理所自己看着办吧，我和妹妹不出席了才解决了问题。我在父亲骨灰安放仪式一字不改的念了我的发言稿。我始终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心理所这么不能接受我的发言。现在再重新看我的讲话我也依然不明白，原文：

各位首长们，伯伯，叔叔，阿姨们，同志们：

今天在这里为我父亲举行骨灰安放仪式，我们兄妹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父亲去世已经九年多了。多年来，在林彪，‘四人帮’的错误路线影响下，对于我父亲一直没能有正确的评价。这样一个简单的骨灰安放仪式也不能举行。只有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后，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才能得以落实。经过院领导的支持和广大革命群众的努力，终于冲破‘四人帮’的帮派势力所设置的重重障碍和阻力，为父亲恢复了名誉。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我们感谢党，感谢华主席，感谢院领导。

父亲自回国后，在科学院一直为党和国家勤勤恳恳的工作。尤其在我国的心理学事业上，为建立我国自己的唯物主义的心理学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力量。父亲以及心理学界的全体同志们在为祖国的科学事业上所作出的贡献是任何人也抹杀不了的。虽然在文化大革命，心理学受到了以文痞姚文元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的摧残，最后竟全盘否定。但父亲对自己的事业始终坚信不移。对于群众运动毫无任何怨言，充分表现出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父亲对于我们兄妹俩从来都是严格要求，并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在他病危时还嘱咐我们要好好学习，好好工作。父亲为我们做出的榜样，使我们作子女的永远不能忘记。今后我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更应努力工作，为实现我国的现代化而做出自己的一点努力。

在林彪，‘四人帮’错误路线横行时期，心理所受到‘四人帮’的帮派体系的直接插手，把个好端端的心理所糟蹋得不成样子。而所的某些负责人的确也干了许多违反党的方针政策的，给党和国家造成巨大损失的错事。现在，在院党组的正确领导下，心理所新党委正在对这些错误进行改正。这的确是令人高兴的。我希望这种好的风气能够发扬下去，是我国的心理学能够逐渐恢复起来，使各方面的政策都能得以落实。

在为筹备这次骨灰安放仪式的过程中，由于院领导的重视以及许多同志的辛勤工

作，才是的落实党的政策的工作能顺利进行。我谨向这些同志们表示感谢。另外，在我父母去世后，在我和妹妹极端困难的时候，有许多同志不顾自己的安危，曾极热情的关心，爱护，帮助，照顾过我们兄妹。对于这种患难之交，我们将永远不能忘。今天，借此机会向这些同志表示深切的感谢！

我的话完了。谢谢全体同志们的光临。

一年后我们兄妹离开了中国。我们带走的只是无限痛苦的回忆和无法医治的精神创伤。到荷兰后不久，应我们的要求荷兰外交部让我们看了从1968年夏到1970年底荷兰外交部为查询我的父母及我们兄妹的下落致与中国外交部（及公安部）的全部外交照会。中国方面的反应和答复让我们目瞪口呆。从此我们和大陆再也没有任何来往。我们在中国生活的29年里，没有任何人认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兄妹无奈的接受了这个现实并永远的离开了中国。这是因为鉴于我们的出身，背景和经历我们在中国不可能有普通人的生活的。

2004年5月收到杨玉芳所长请我和妹妹去北京的邀请信后我考虑了很长时间。二十五年之后重返北京对我们来讲当然是感慨万分。我在去之前就想好不打算同任何人有任何讨论或争论。我知道在北京我是必须说几句话的。我想说的还是我26年前对中国心理科学的期望。2004年8月10日我在心理所座谈会上说了下面几句：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老朋友们，

我和妹妹回荷兰生活已经25年了。1979年7月我们同心理所告别时还是在中关村的福利楼。当时任何人也不会想到曹日昌的子女有朝一日会再来中国。借此机会，我愿意谢谢心理所杨玉芳所长。是她邀请我们到这里来。谢谢周智红、冷立行二位的周到安排。谢谢丁素因去年年底到北京来时发的一顿牢骚。我们特别感谢陈绍英、潘宁堡夫妇为我们此行所作的努力。

1950年夏，父母带我们从香港来到北京。此后的16年里父亲为中国的心理学发展做出了自己的全部贡献。母亲也在外交和外贸人才培养方面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结局是众所周知的：家破人亡。对于我和妹妹来讲这是一段终生无法忘记的经历。任何人都应该明白和理解我们对心理所1966到1979年期间的所作所为至今还有我们自己的看法。

过去的25年里，我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谈论过中国和心理所。我曾经说过以后如果我有机会，我一定会把我们兄妹在中国的生活尤其是最后的13年写成书。让大家都知道这是一段多么无聊，惨痛和耻辱的历史。让大家不要忘记中国的心理学有过这样一段真是见不得人的经历。我无意指责任何人。这也不是我们这次来北京参观心理所

.....

的目的。我想说的只是下面几句话。

两次世界大战都给欧洲留下巨大的战争创伤。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荷兰90%的犹太人死于法西斯的集中营里。我母亲全家及所有亲属中只有我母亲和我的外公躲过了法西斯的魔掌。为了让历史不再重演，战后不久欧洲就开始了成立欧洲共同体的努力。结果是大家都知道的。同时在过去的六十年里几乎所有欧洲共同体国家每年都要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遇难的人。在荷兰每年5月4日晚上八点全国静默两分钟。每年的5月5日荷兰是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解放日。包括德国在内，所有欧洲国家都不厌其烦的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事实。我觉得心理所也应该这样做。让大家都知道当年的事情才有可能让历史不再重演。不要否认是心理所自己把自己的四个所长整死了三个。不要隐瞒所长夫人（我的母亲）能躲过德国法西斯的集中营却被整死在心理所的监狱里的事实。应该承认是心理所自己把自己的饭碗砸了。不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别人。德国从来也没有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希特勒一个人的责任而是德国自己的错误。正视心理所和中国心理学的这一段历史事实是防止‘隔几年再来一场’最有效的方法。

1987年7月我以优异的成绩和最短的学习时间毕业于Delft科技大学电子系。论文答辩后第二天我去“通讯和交换管理系统”实验室同我的导师Arnbak教授告别。年长我仅五岁的教授把实验室的所有工作人员和学生都叫到会议室。教授同平常一样幽默。在他的讲话里赞扬他这个平日话语不多，实验室里唯一一个喜欢古典音乐，坚决不肯去科研单位工作的学生。我的讲话让大家大为惊讶。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在实验室里谈论我自己。教授这才明白我为什么这样刻苦学习而又拒绝学博士。事后实验室里的人都说他们从来都觉得我是肯定有过一番经历的人。今天我愿意用我当年讲话的最后一段结束我今天的讲话。

“我的父母都出身于极普通的家庭。他们都是完全凭自己的努力成为英国剑桥大学的博士。在他们遭受无端的迫害时，他们从没对自己的信念有所怀疑。从没违反过做人的起码原则。从没背叛自己的爱情。从没后悔过自己所走过的路。但当他们在自己生命最后时刻看到自己的孩子被剥夺了学习的机会和权利，心里的痛苦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将近二十年过去了。父母没有看到自己的孩子只因为自己的正直，诚实反倒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没有看到我现在的生活。他们没能看到今天。此时此刻，我相信全体在座的人都可以理解我是多么想对他们说一句‘爸爸，妈妈，我是你们的儿子’。愿上帝能告诉他们”。

我的话完了。谢谢！

我尽力控制自己的感情冷静的念完了我的讲稿。会场鸦雀无声。没有任何人有任何反应。

我明白我的讲话触到心理所的痛处了。几个星期后我很偶然的看到心理所在自己的网站上提到了我的讲话。在题为“心理所邀请曹、丁、潘先生的子女回国参加第28届国际心理学大会”的报导里是这样写的：

…10日上午还特别安排他们参观心理所，并与老朋友座谈。座谈会由杨玉芳所长和赵国胜副所长主持，荆其诚夫妇、徐联仓夫妇、李心天、万传文、赵莉如、汤慈美、周龙保、张嘉棠等出席了会议。会议上大家回顾了三位老先生的敬业精神、严谨认真的态度、宽厚待人和对子女严格要求的作风；杨所长介绍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心理学的蓬勃发展和心理所的巨大变化，并指出心理所能有今天，离不开三位老先生在建所初期打下的基础。曹先生的儿子曹增义代表三家子女对心理所的盛情邀请和周到的安排表示感谢。这次是曹家兄妹俩25年前去荷兰定居后的第一次回国，他们感谢心理所为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并希望心理所人不要忘了过去，不要走过去曾走过的弯路。举办此次活动既表达了新一代所领导、心理学家对老一辈所领导、心理学家的敬仰和缅怀之情，也将慢慢化解历史上遗留的一些积怨。

曹增义

1948年生于英国剑桥。北京三十五中67届毕业生。1969-1974年插队。1975-1979年科学院化学所机械修理工。1987年毕业于荷兰Delft科技大学电子系“通讯和交换管理系统”专业。现任荷兰国防部通讯部高级工程师。

怀念曹日昌同志

《心理学报》编委会

原中国心理学会副理事长、心理研究所副所长、《心理学报》主编曹日昌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我们怀着敬仰和沉痛的心情表示深切的悼念。

曹日昌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国著名的心理学家。他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热爱中国共产党和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他毕生从事心理学工作，为发展我国心理学事业作出了宝贵的贡献。曹日昌同志早年就学于清华大学心理系，参加过当时的爱国学生运动，一九四五年赴英国留学，一九四七年在英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八年在香港大学任教，并兼任中国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香港分会的工作。一九五〇年初来中国科学院，历任院办公厅副主任、计划局副局长、联络局副局长、心理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心理学会副理事长、《心理学报》主编等职务。

曹日昌同志积极领导了心理研究所的筹建工作。多年来他一心扑在心理学研究上，著译了许多心理学文献，主编了《普通心理学》教科书，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作出了成绩。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学风，亲自率领心理研究所研究人员到工厂、部队调查研究，促使心理学更好地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曹日昌同志在新中国科学事业上的辛勤劳动和卓越成就，我们永志不忘。

曹日昌同志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积极参

加党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注意改造世界观，努力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自己的工作。他忠于党的事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治学严谨，认真负责；对同志热情诚恳，平

易近人；对青年循循善诱，悉心指导。在一九六五年反动文痞姚文元发表鼓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黑文时，他立场坚定，态度鲜明，表现了较高的路线觉悟。

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万恶的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曹日昌同志受到残酷的打击迫害，含冤去世。粉碎“四人帮”后，已予平反恢复名誉。曹日昌同志作为一个优秀的党员科学家的形象，永志难忘。

曹日昌同志的逝世，是我国心理学界的一大损失。我们要认真学习曹日昌同志的革命精神和治学态度，加倍努力，埋头苦干，为把我国心理学搞上去，为尽快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

（注：该文来源于1979年第2期《心理学报》。）



回忆

董桂香

2005年的一个夜晚，我的手机响起，接通之后电话那一端传来了既熟悉又陌生的声音：“我是曹何丽，董桂香，你好吗？”我当时手发抖，激动万分，语无伦次地说了些什么已经记不清了。接完这通越洋电话，我坐在沙发上哭了，尘封已久的往事在漫漫的长夜里一幕一幕的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曹何丽是我分别了27年的好友。1963年我们一起步入了中学大门，文革时期我们一起去内蒙古插队。曹何丽的父亲是我国著名心理学家曹日昌先生，她的妈妈色尔玛是荷兰诗人，当时在北京第二外语学院任教。

在那段令人难忘的悠悠岁月中，我和曹何丽以及她的家人度过了很多温馨快乐的、艰难困苦的时刻。

今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组织曹日昌先生的百岁诞辰纪念会。谨以此文献给已逝的曹日昌先生，同样也献给所有怀念曹先生的亲人和朋友。

1963年刚步入中学大门的我发现我们初一 <3> 班有一个外国女孩。她修长的身材，棕色卷曲的头发，一双欧式的大眼睛，尖尖的下巴，笑起来好看极了。当时我正在读保尔柯察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的女友冬妮亚聪明美丽，举止高雅。看到曹何丽的一瞬间，我马上联想到了美丽的冬妮亚，我很喜欢她。后来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

曹何丽的家住在西内大街195号院内

（原中国科学院宿舍），据说这座大院是清朝一个王爷的居所。院子古香古色，红色的大门，高高的门槛，两个雕塑精美的石墩安放在大门的两边。这里是我每天上下学必经之路，三年的同窗生活，我和曹何丽结伴而行，形影不离，一路上谈笑风生，无话不说。

我第一次见到曹日昌先生是在我放学的路上。那天我和曹伯伯的女儿曹何丽正走在回家的路上。一辆小轿车在我们身边停下了，走下来一位穿着风衣戴着眼镜的中年男子。曹何丽告诉我那是她爸爸。我当时很紧张，因为知道曹伯伯是一位留过洋的科学家。胡同里长大的我看到这么一位风度翩翩的大人物紧张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曹伯伯笑咪咪、非常友好地与我打招呼。我紧张的心情一下消失了，多么亲切的伯伯呀！

曹何丽告诉我，开车的司机叫刘安全，一听这个名字我笑了起来，这个名字与他的职业是多么贴切呀！这么多年过去了，与曹伯伯的第一次见面留给了我太深的印象，以至于连司机刘安全的名字都牢记了几十年。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成了曹伯伯家的常客，曹何丽也经常去我家串门。我家和曹何丽家生活条件相差甚远，但是我们两家却建立了深厚而纯朴的友谊。

有一次妈妈在给我做布鞋时也给曹何丽做了一双千层底的布鞋，她十分高兴。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曹伯母经常让我给家里

带去洗衣粉、香皂之类的日常用品。

我很喜欢去曹伯伯家玩。曹日昌先生，曹伯母还有曹何丽的哥哥也都很喜欢我，他们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记得有一次，我们一起在曹伯伯家里的客厅里看电视（六十年代，中国有电视机的家庭太少了）那一天电视里正在播放越南杂技团猴子钻火圈的节目。小猴子可爱调皮的表演让我忍俊不止，一旁的曹伯伯、曹伯母看到我使劲捂住嘴忍住笑的样子，也笑了起来。

知识渊博的曹伯伯，端庄秀美、仪态大方的曹伯母，帅气的曹增义以及室内的装饰都让我神往。不经意间，我在曹伯伯家学到了很多礼仪礼节：与人交谈要注视对方，约会时穿着打扮要得体，吃饭时不可以吧唧嘴……

曹日昌伯伯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心理学家，他还是一位慈祥称职的好父亲。他非常爱他的一双儿女，无论工作多忙他都准时参加学校的家长会。冬天曹何丽每次晚回家他都要拿着手电筒去接孩子。

然而青春时代的快乐却是短暂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祖国的灾难降临了。一夜之间世界全变了。在那颠倒黑白的日子里，无辜的曹日昌伯伯曹伯母先后惨遭迫害，最后含冤去世。在曹伯伯生命的最后阶段，他的坚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被病痛折磨得难以忍受时，曹伯伯都不呻吟一声。肝癌是多么的疼啊！豆大的汗珠流了下来，骨瘦如柴的他对时局只字不提。他那时作为父亲唯一想做的就是忍住心灵和身体的痛苦，别让孩子担惊受怕。在病床上，他偶尔会对我们讲一些他大学期间的的事情。现在回想起来，不知在无尽的黑夜中，曹伯伯脑海中会浮现什么？

曹伯伯怀着无限的不解与遗憾离开了人

世。我现在只要一想起病榻上的曹伯伯，一阵阵心痛就会向我袭来，这种心痛令人心碎。曹伯伯一直把我看成一个可交，可以信赖的小朋友，而我却没有在他弥留之际说一些温暖的话，做一顿可口的饭菜，握一握他的手。我只是泪汪汪地看着他凄惨地离开了人世。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后来我和曹日昌先生的女儿相伴度过了又一段艰难的知青岁月。我没有辜负曹伯伯对他女儿说的话：何丽，董桂香是你一生的朋友！

我和曹何丽一起作为知识青年去内蒙古插队。我们在农村共同经历了劳苦、饥饿、寂寞，我们相互慰藉，一起度过了那段悲凉的年代。

1979年我的好友曹何丽去荷兰定居了。1991年我在国家落实知青政策后也返回了北京。回到新街口地区的父母家中，只要有空我总要去西内大街195号院内看一看敬爱的曹日昌先生和他的家人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尽管灰色的小洋楼已经破败，但是它却承载了我对曹伯伯的无尽怀念。在我的童年记忆里，这里的庭院，天井，夹道，错落有致的屋脊仿佛像童话一般。每年的七月八月槐花香气浓郁，整个院落显得幽雅恬静。然而此时斯人已去，只有楼前的槐树依然在此坚守。

曹日昌伯伯，曹伯母，安息吧！



曹何丽（曹日昌先生女儿）与同学董桂香合影

魍魎革命慾卑脏 文化不与论短长

——纪念曹日昌伯伯诞辰100周年

丁宗一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脑的反映功能最基本的有三方面；一是感知觉……，一是记忆……，一是思维……。自《曹日昌心理学文选》139页。

今年是曹伯伯诞辰100周年，离世42周年；曹妈妈（色尔玛先生）诞辰90周年，离世43周年。

无论是白昼，还是暗夜，无论在异国他乡，我都深切地怀念你们。

我们朝夕相处的日子是在东厂胡同二号。这是一座很有历史色彩的府邸，有记载的资料表明它源自明朝魏忠贤；嗣后，历代多有名士居于此。刚刚解放的新中国，诸多科学，文化精英相率来归。曹伯伯也在此时由香港举家北上参与中国科学院的建设工作。第一次见到他睿智和藹的目光和洋娃娃般的增义和何丽兄妹，原先那种要见“外国太太”的紧张羞涩的情绪荡然无存。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曹妈妈总是把何丽的小车推出来，在静谧的绿荫下一边读书，一边晒太阳。在那个年代，把小婴儿放在户外晒太阳，还是很异样的举动。看到何丽静静地睡

在小车里，曹妈妈会告诉我，晒太阳预防佝偻病的道理。这，就是我早期的医学启蒙教育。有时，我们也会有“冲突”：或是语言沟通的误差，或是成人与儿童的认识不同。在墙上会见到歪歪扭扭的“打倒帝国主义”标语，那，就是我的愤怒。我妈妈对我教育了一番，说曹妈妈是来中国帮助我们工作，参加新中国的建设的；而外国人并非都是帝国主义。这是我早期的国际主义教育。曹伯伯常来家讨论科学院心理所的创建，发展中国的心理学。他们经常彻夜长谈。在科学院保留心理学这块园地是他们内心的期盼。那时并非一帆风顺，不少的权势人物反对在科学院建立心理研究所。在决策层面，丁瓚是执意要建立的，郭（沫若）伯伯是坚决支持的；但需有人在第一线操持，才能成功。这个人，就是曹伯伯。从无到有，这就是他们那代人的责任和使命。

.....

我们两家朝不保夕的日子则是在端王府。这也是一座很有历史背景的府邸，著名的是那个支持义和团的端亲王。或许是历史魍魉的阴魂作祟，在那场肮脏的革命里，我们两家又在这一起度过了父辈们的余生。以他们的鲜血和生命祭奠了他们亲手创建的中科院心理所。从有到无，这就是历史和他们开的一个庸俗而卑鄙的玩笑！

邓琮琮、张建伟在《中国院士》一书中有一个统计：“中国科学院在10年中，被抄家的达1909户，被迫害致死的229人”。作者还开列了一份被迫害致死的高级科技人员——多数是学部委员的名单，他们是：“熊庆来、邓叔群、赵九章、叶渚沛、张宗燧、刘崇乐、曹日昌、丁瓚、周仁、黄汉武、姚桐斌、李璞、司幼东、萧光琰、余柏年、陈绍澧、雷宏叔、伍钦荣、叶企孙、饶毓泰、许宝騄。（饶毓泰、叶企孙、张宗燧以及不在此名单中的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谢家荣是自杀。）”。其中，仅一个心理所就迫死两名所长。为全院各所之最。这短短的冰冷的几个字，背后是骇人听闻的丑恶的人权纪录。

端王府的日子是阴暗而灭绝人性的。那里发生的事件是人类文明史和文化进程中鲜有而无耻的，是变态心理的极好的标本。你天天浸泡在喋喋不休的语录呱噪之中，歇斯底里的打砸抢展示了性无能者典型的内心扭曲和精神欲求。那种令人发指的常规殴打，侮辱；那每日数次的批斗会，终日惩罚性超负荷体力劳动；明知他们年高体弱多病，却设计出许多常人无法做出的体位，强令他们

去做；工资扣发，只有微薄的生活费，而且明令周围的商店不许我们买牛奶，鸡蛋或肉（其实，也买不起！）。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即使是在这种非人的条件下，曹伯伯每次都自己做重活，让父亲尽量休息或做轻活。在做煤球时，曹伯伯总是让丁瓚切块，自己和煤泥与摇煤球。夕阳下，在一行斑斑的血迹浸入土地上，拖着长长的蹒跚而行的身影，这就是曹伯伯扶着被毒打后的丁瓚回家。这两位学术界的知己和隐蔽战线的战友在囹圄之际仍然是那样的伟岸！像惠特曼诗中所颂唱的那样：“受苦而又坚强，那是何等的崇高！”

我和曹伯伯的见面仅仅在每天清晨在端王府水房旁边的公共厕所。默默地注视，传递内心的问候和只有我们才理解思念。1968年5月16日清晨（丁瓚迫害致死的第二天），还是在那个厕所，我们相见；曹伯伯的极度忧郁而愤懑的眼神，就是在今天，我依旧历历在目。他轻轻地问我：“不在了？”，眼里充满了泪水。我微微地点了点头。他扶着我的肩，只觉得阵阵的战栗。我们默默地离开了。后来，我失去了自由。几年后，当我恢复自由时，曹伯伯早已不在人间了。时传的原因是所谓的“肝癌”，实际上是长期非人的精神折磨和苦役般的体力透支。当曹妈妈被迫害致死时，非逼着曹伯伯到遗体前“划清界限”。面对患难与共爱妻的非正常死亡，看到这惨不忍睹的场面，想到挚友纷纷惨死，能不得“癌症”吗？我们习惯用受害者躯体的疾病来粉饰加害者灵魂的卑鄙，却不知加害者猥琐的灵魂耗磨的是

民族的正气，贻害的是子孙后代，绵延不尽的是精神哲学贫困的不治之症。

我再度见到增义，是在24年之后，在法国，巴黎，一座阅尽人间苦难的浪漫城市，一座让你知道什么是文化的城市。那次，也是我和姐姐（丁素因）分开后15年后初次相见。假丁素因出差法国参加学术会议，我们相约聚会于巴黎。增义，我和姐姐（丁素因）漫步在埃菲尔铁塔之下，徜徉在塞纳河边，默思在巴黎圣母院，从蒙何马赫特高地遥望拉德芳斯，我们不能相信，今生我们还能相见，却是天各一方：增义、何丽在荷兰，姐姐在美国，我在法国。命运把我们分开；然后，又让我们聚首。那场肮脏的革命粉碎了我们和睦温馨的家庭，我们成了孤

儿！但我们的心是一气的。再有艰难困苦，我们会好好活着，而且一定会相互寻找的。后来增义又来到我居住的里尔，我们同睡一室，打地铺，彻夜聊到天明。

法国有一个警句，谓：“当你失去一切之后，尚存的，就是文化”（La culture c'est tout les rest que les voublie）。这就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信仰，修养和精神。

当我们失去一切之后，我们深深地怀念我们的父辈！感谢他们给了我们高尚的文化。

以此，纪念曹伯伯和曹妈妈；以及，在那场肮脏革命中被剥夺生命的所有的人。

对中国历史上那最黑暗的一页，我们说，不！

参考文献：

1. 邓化雨：我在端王府的日子 内部资料。
2. 邓琮琮、张建伟：中国院士。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3月1日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ISBN 9787533908867
3. 赵莉如 编：曹日昌心理学文选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5年11月第一版，2005年第一次印刷。
ISBN7-18542-X G-11631

作者简介

丁宗一

中国医学科学院/协和医科大学研究生院毕业，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获国务院特殊津贴，中国医师协会儿童健康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亚洲儿科营养联盟主席，国际儿童食品法典委员会核心组专家(Codex CAC)，国家特殊膳食标准技术委员会委员，国家玩具召回小组

.....

专家委员会专家，国家“十一五”期间全国家庭教育专家团成员，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体育台养生大世界栏目“公益养生传播大使”。

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生优育中心名誉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总医院技术顾问，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总医院附属八一儿童医院名誉院长。

中华预防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常务理事，中华儿童保健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儿科学会儿童保健学组顾问，中国医师协会理事，中国优生科学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优生优育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诸福棠奖金（加拿大）提名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国儿童网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中国少年在线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中国儿童安全健康成长计划专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国优生科学协会儿童健康教育工作委员会副理事长，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中心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人民卫生出版社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食物与营养咨询委员会《中国食物与营养》理事会理事，美中儿童发展中心理事长（美国注册），中国女医师协会专家顾问组专家，中国社会工作协会社会心理健康服务指导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少年儿童研究杂志编委，1996年在北京儿童医院创立“儿童健康与环境研究室”，2004年创立中国医师协会儿童健康专业委员会，2007年创建胡亚美-张金哲院士奖。

第23届国际儿科大会筹委会委员，集资展览委员会副主席，宣传委员会主席，社会活动委员会主席，学术委员会委员。

中国实用儿科杂志副主编，中华儿科杂志编委，中国临床实用儿科杂志编委，现代职业安全杂志编委，药物与人杂志编委，美中妇产科杂志编委，生命世界杂志编委，中国循证儿科杂志编委会学术顾问，父母必读杂志专业顾问，中国临床实用儿科杂志编委，医师在线执行主编。

1987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996年获吴阶平医学研究奖；1998年获北京市科技进步叁等奖两次；1998年获刘士豪儿科研究一等奖；1998、1999、2001年获中华儿科杂志优秀论文奖；1999年获北京市科学技术进步奖叁等奖；2000年诸福棠儿科医学奖两次；2000年中华医学会优秀论文奖二等奖一次、叁等奖二次；1983-2000卫生局科技进步奖（1，2，3等）12次；2002年获杨崇瑞妇幼卫生奖；2005年获“中华医学杂志”1915-2005年(90年)发表论文最多，被引次数最高的“金笔奖”；2007年获中华儿科杂志1978-2006年发表论文最多，被引次数最高第一名作者奖；2010年获国务院颁发的“中国医师奖”；发表论文320余篇，著书12本。1998年应美国克林顿总统邀请参加在桂林召开的五人环保圆桌会议。

2011年5月1日

1.



2.



1. 1960年秋，曹日昌先生携家人与心理所同事一同游览十三陵水库

2. 1962年10月，曹日昌副所长（后排左四）与二室（知觉、记忆和劳动组）科研人员及研究生在北海白塔下合影

3. 1962年国庆，曹日昌先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巧遇心理所同事张梅玲、张瑶，三人合影留念。

4. 1947年12月17日，曹日昌夫妇婚礼，荷兰，阿姆斯特丹



3.

4.

交往与家庭

1.



2.



1. 1957年6月19日，曹日昌最后一次出国访问前，夫人与女儿在北京心理所门前送行

2. 1966年3月，曹日昌先生全家合影

3. 1963年8月，曹日昌先生全家在北京颐和园合影

4. 1950年3月，曹日昌与儿子曹增义在香港



3.

4.

纪念曹日昌先生
(1911-1969)

学术思想暨

诞辰

100



周年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AS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大屯路甲4号
邮编：100101
电话：010-64859028
传真：010-64872070
邮箱：suokan@psych.ac.cn